



徐家棚位于武汉市武昌区西北角，1909年因粤汉铁路北端起点由鲇鱼套移到徐家棚而兴。随着徐家棚站的兴建，中外居民纷至沓来，“沟边街”“洋园”和“粤汉里”等地名相继诞生。2019年底随着武汉城市发展，拆除铁路北环线，建设长江主轴规划中的武昌滨江商务区，位于徐家棚区域的武昌北站及其周边的多条富含铁路文化的历史街巷大都被拆除。照片是我2016年12月拍摄的武昌北站和绿皮市郊列车，乘客主要是铁路职工、沿线居民和进城卖菜的农民。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场景，重涉昨日之河。

（供图 / 撰文 邹岩）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3年第11期（总第373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董菲 杨华

熊少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燕来宾 潘红莲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

4 利用外资助力武汉天河机场建设 / 张智海

风雨同舟

<<<< <

12 江城绽放“格桑花” / 侯伯云

九城同心

<<<< <

16 “我本楚狂人”——李白与湖北安陆 / 朱绍斌

委员天地

<<<< <

21 为民发声做心桥，扎根教坛育英才 / 常福曾

商聚汉皋

<<<< <

25 企服市场“摆渡人”的创业之路

/ 胡荣阳(口述) 鲁晓伟(整理)

目录

CONTENTS

都市史话



- 29 夏口筑城与武汉双城格局的奠定
——纪念武昌建城 1800 周年 / 涂文学

史海钩沉



- 37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中) / 张笃勤
45 一位比利时医生镜头中的晚清武汉
/ 麻建雄 孙庆力 韩少斌

人物春秋



- 51 陈松林:黄陂籍院士打造水产种业“中国芯” / 裴高才

扫街探疑



- 58 辛亥将军开发的大陆里与多闻里 / 田联中

往事漫忆



- 63 李国平教授轶事偶记 / 胡继堂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利用外资助力武汉天河机场建设

◇ 张智海

轮印：1993年12月29日，武汉天河机场举行建成校飞仪式。南航一架波音737飞机，在机场3400米跑道进行NDB导航设备校飞起降，获得圆满成功，列入当年“十大新闻”，至今已30周年。天河机场目前拥有航线170多条，通航城市国内72个、国际（地区）47个，成为我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

武汉天河机场兴建于1990年，为国家“八五”重点项目。

建设天河机场，是完善、提升城市功能，适应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必然之举，也是武汉经济社会和民航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当时城市财力十分有限的条

件下，由于采取多元化筹资尤其是引进利用外资，较好解决了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使机场建设得以顺利推进，如期完成。

修建新机场势在必行

首先，有必要对武汉民航业的源起和机场情况作简略回顾。

1930年至1931年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飞运航空公司合资）和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相继来汉口开办航空事务所，在江岸分金炉长江边设立水上机场，供水陆两栖飞机起降之用，上下机乘客和货物以大木划子运送，武汉民航业自此肇始。每周有四个航班，飞



1990年12月16日，天河机场建设工程奠基

沙市、宜昌、万县、重庆。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分金炉水上机场停运。

1935年，湖北省建设厅受国民政府交通部委托修建武昌南湖机场，次年完成。南湖机场占地4000亩，有两条各宽50米的跑道，东西向跑道长1450米，南北向跑道长1550米。先期为军用，后改由中国、中央（原“欧亚”）航空公司使用，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有航线5条，每周18个航班。1948年后期，“两航”驻汉单位迁香港，武汉航空站撤销，南湖机场荒废。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南湖机场由中国民航局接管。1950年，中国民航局在汉成立中南民航办事处，对南湖机场组织恢复性维修，于1951年8月1日开航，为武汉地区唯一民航机场。此后的30多年，南湖机场先后进行过三次改（扩）修，加长加宽加厚跑道，扩建站坪和候机楼等，但从总体来看，机场规模、格局、飞行条件和设施配备改变不大，而武汉的城市规模和性质却发生了巨变。

1949年武汉解放时，建成区面积仅为

34.7平方公里，人口102万，生产总值2.08亿元。经4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1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到1990年建成区面积189.3平方公里，人口690万，生产总值176.83亿元。城市不断扩张，人口快速增长，生产力大幅提升，使武汉由原来的商业性消费城市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南湖机场的民航业务也迅速发展。旅客吞吐量1978年仅为6.5万人次，

1985年增至23.34万人次，1990年接近60万人次，1992年突破100万人次，1994年（机场关闭、搬迁前一年）达到108万人次，为通航44年来最高记录；货运业务也相应稳定上升。因此，机场设施不足的矛盾和运载能力的局限便日益显现，主要是机场只有一条跑道仅长1812米，飞行带宽仅为150米，没有停止道和净空道，只能起降波音737-200及以下中小型飞机，稍大一点的飞机减载才能起飞。站坪面积仅为46100平方米，只能停放飞机十几架。旅客候机厅体量小，仅为3453平方米，与进出港旅客流的快速增长很不相适。

此外，从市内到机场需经过长虹桥铁路道口，进出机场车辆往往受阻，成为一个交通“瓶颈”。“鉴于武汉地处全国中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客运需求量大，而现有南湖机场跑道短，净空条件差，已被市区包围，无扩建条件”（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组评语），不仅严重影响飞行安全，还对城市构成潜在威胁，不论是经济、社会和民航事业发展还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

设要求，修建新机场都是势在必行。而早在1973年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中国民航局工作汇报时就提出武汉要修建国际备降机场，但由于时局与经济等原因，后续工作未能展开。所以，修建新机场也是为了落实当年周总理的指示。

选址立项和建设前期工作

机场是航空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新机场，面临的首要也是最大问题，是选址立项。选址，旨在确定机场建设地点；立项，则表示主管部门核准同意机场建设。完成选址和立项，才能开展建设前期工作，包括进行可行性研究、编制项目建议书、征地拆迁和建设招标等。

机场选址以确保飞行安全为前提，根据地理位置（距离城市远近）、地形、地质和净空条件、周边环境（气候、水源）等因素，着眼近期建设和长期发展，提出方案。

武汉新机场选址先后提出过5个方案。

1973年周总理指示武汉要建国际备降机场之后，中国民航局即组织开展选址工作，提出武昌流芳岭、鄂城华容和汉口茅庙集三个场址方案，均因与武汉空军的山坡、王家墩机场飞行航线冲突而被否定。1984年，经武汉市政府、武汉军区空军和中国民航局三方共同努力，新机场场址才基本确定在黄陂县境内。在此基础上，武汉市政府组织踏勘并经反复研究对比，拟定了“丰荷”方案（即黄陂县滠口镇丰荷山附近），上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85年2月，根据时任副总理李鹏的批示，中国民航局会同国家计委和武汉市政府，对“丰荷”方案进行实地踏勘验证，认为其距王家墩机场较近，不宜修建大型机场。随后，去丰荷山西北约

5公里的天河镇夏家埠至闵家田一线进行勘察，认为这里地势较平缓，净空条件好，作为新机场场址较理想，于是提出了“天河”方案，征得武汉军区空军同意后，由武汉市政府上报湖北省政府。4月，省政府向国务院、中央军委转报《关于新建武汉大型机场的报告》。此前3月11日，中国民航局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武汉机场选址的报告》。7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天河机场场址的批复》同意武汉新建机场场址定在黄陂县天河镇辖区，新机场因此定名为“武汉天河机场”。

根据国家关于基本建设的程序规定，新建工程在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即“预可研”）的基础上编制项目建议书（即申请立项报告，选址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按隶属关系报请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立项，而后开展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武汉新机场为国家重大项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项目选址即等同立项，权威性更高。

1987年7月，武汉市政府向国家计委呈报了《武汉天河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经认可后又与中国民航局联名上报“设计任务书”，国家计委审查同意于1989年3月17日批复。

设计任务书明确，天河机场为一级民用兼国际备降机场，飞行区等级为4-E级。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建设原则，一期工程以满足2000年旅客吞吐量420万人次/货运量3.5万吨，符合波音737-200型飞机全载起降技术要求进行设计，修建一条长3000米、宽45米的跑道和一条平行滑行道；客机坪12个机位，停机坪10个机位，停车场2万平方米，航站楼2.5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厅和国际厅，高峰每小时可通过旅客1700人次。

关于机场设计分工，主体工程由中国民航机场设计院担纲，包括总平面规划、飞行区、航管、导航、无线通信、气象和供油等建（构）筑物设计；中南建筑院承担航站楼、工作区设计；中航工业规划设计院、中南市政院、武汉规划院等十几家单位，配合其它辅助工程设计。

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机场建设的重要保证。1989年1月，武汉市政府依据“以地方为主、民航参与”模式，成立了由市有关委办局、民航湖北省局、黄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武汉天河机场建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简称机场办）作为项目法人，担负机场建设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7月，武汉市政府、中国民航局和国家交通投资公司共同成立天河机场建设领导小组，统一指挥机场建设。

征地拆迁是建设前期工作的重要环节。天河机场工程计划征地5484.8亩，涉及黄陂天河、横店、滠口、罗汉4个镇和武汉江岸、江汉、东西湖3个区的47个自然村4925人，任务之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指挥部领导下，机场办充分发挥县（区）镇（乡）两级政府的职能优势，督促协同黄陂县政府开展征地拆迁工作，严格执行政策规定，通过实行“建、拆、搬”方针和“给钱、发证、定点”办法，及时到位征地拆迁款和还建资金，迅速办理“农转非”2833人，安置劳力1650人，安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征地拆迁顺利完成，为接下来的工程建设“四通一平”（即水、电、道路、通讯“四通”和场地平）创造了条件。

为了确保机场工程如期动工，机场办在进行“四通一平”的同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开展工程招标，择优遴选施工队伍。通过竞争，选定中建一局、二局，空港

七处，武汉市建一公司、市政二公司和机械化公司，铁五局、十一局以及黄石建总等数十家施工单位，分别承担工程任务；选定武汉市重点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承担工程监理；联系市建筑、市政质监站和省建筑检测中心等参与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和核验。至此，天河机场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工程开工。

实施建设和组织会战

1990年10月24日，国家计委批准天河机场工程开工，列为“八五”重点项目。12月16日，机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典礼由副市长、机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王守海主持，市长赵宝江致辞，中国民航局基建司司长刘生乐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驻京办代表青晴海发言祝贺。各界人士和参建单位员工数百人参加典礼。笔者作为市建委工作人员，有幸在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还得到一份简朴而有特别意义的“星球”模型纪念品并收藏至今。



天河机场开工典礼纪念品“星球”模型

典礼甫一结束,现场机械轰鸣,中建二局、空港七处和武汉市政机械化公司承担的飞行区土方工程正式开工。

计划管理是机场建设的“龙头”。机场办按照市政府1993年建成机场的总目标,以场道和航站楼工程为主导,精心编制网络计划,作为控制建设进度的依据。目标管理小组将网络计划所列项目按工期、质量分解成管理目标,与参建施工单位签订责任状,严格考核,奖罚兑现。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机场办结合国家正在推行的建设监理制度,成立建设监理处,制定“天河机场建设工程监理细则”,指导、督促监理单位,共同对勘测、设计、招标、施工进度、质量、成本和重要材料设备,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监理,从而有效克服了重施工轻管理、重进度轻质量的倾向,使工程进度按计划,质量达标准。

土方施工直接关系和影响场道和土建工程进度。1991年春,正当土方施工全力推进之时。天河地区遭遇多年少见的连阴雨,接着又是几个月的干旱;而这里的土质为膨胀性粘土,特点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雨季泥泞施工机械打滑,站立不稳行进困难;旱季地表坚硬,施工机械推挖不动。机场办干部深入一线与施工单位员工一起克难攻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埋头苦干打硬仗,如期完成45.4万方土方任务,为场道、土建施工打下基础。

航站楼是机场主体工程之一,由市建一公司承建,1991年2月1日动工。自此,航站、航管、气象、场道等25个子项工程施工全面启动。



天河机场(一期工程)航站楼塔楼正在施工

场道二灰土下基层施工在武汉地区属首次,没有完整的工艺可循,成为施工难题,经多次实验仍不符合规范标准,施工单位一筹莫展,十分着急。监理处负责人就到现场与施工单位一起分析原因,邀请市政工程学会专家来作技术指导,反复取样实验,终于成功掌握了最佳含水量和配比,摸索出“三筛”“机拌”“五检测”的工艺方法,确保了二灰土下基层施工质量。这只是机场建设诸多技术攻关的一例。

1992年初,正当机场建设如火如荼加紧推进之际,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中央批准武汉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省委、省政府亦确定以武汉为龙头的湖北经济发展战略。为适应扩大对外开放,发挥武汉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吸取国内有的机场刚建成投入运行就申请扩建的教训,机场建设领导小组于9月17日召开会议,决定把天河机场建成国际机场。为此,将机场跑道长度由3000米延长到3400米并预留200米,跑道宽由45米扩宽至60米,平行滑行道道肩由

7.5米加宽为10.5米，跑道、滑行道、站坪厚度由30—34厘米增至34—38厘米，以满足波音747—400型飞机全载起降技术要求。此外，站坪宽度向主跑道一侧增加65米即扩大3.5万平方米，停机坪增加6.65万平方米，航站楼候机厅增加800平方米，增设了3座登机桥机位。经过两年建设施工，26个大项全部开工，飞行区主跑道、滑行道和航站楼、航管楼（包括53米高的塔楼）土建以及供水、供油工程等基本完成，天河机场初具规模。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指挥部根据不同时段的任务要求，先后组织了三次卓有成效的会战。一是建设初期突击土方工程会战，为后续土建施工赢得了时间。二是1993年夏突击土建工程会战，80多个施工单位上万名员工战高温，斗酷暑，夜以继日辛勤劳动。市领导来慰问时，看到热火朝天的大干场面，不禁动情地说：“你们这才是干社会主义啊！”经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按期完成了航站、航管、气象楼、雷达站、机场办公楼和生活区楼群等共计16.8万平方米的施工任务。三是同年秋冬突击通讯、导航、气象、雷达等设备安装调试会战，组织施工单位技术人员和民航、外国专家（进口设备国厂商所派）共同奋战确保工期，使机场工程初验校飞如期进行，实现了3年建成机场的目标。

1993年12月29日，举行天河机场建成校飞仪式。南航一架波音737飞机，在机场3400米跑道进行NDB导航设备校飞起降，获得圆满成功。

1994年12月26日至28日，在前一段全面整改、自验、复验的基础上，天河机场工程国家验收委员会对机场进行总验收，106个单项工程中63个评为优良，其余为合格，具备通航条件，同意交付使用。认为天河机场无论是工程质量还是建设标准，都堪称国内一流水平。29日，中国民航总局颁发武汉天河机场使用许可证。同日下午，南航一架波音737客机满载乘客从北京起飞，15时15分平稳降落天河机场，随后举行了天河机场首航仪式。

1995年4月15日，天河机场正式通航营运。同期，为机场配套的全封闭、高等级专用道路建成投入使用，全长17.8公里，路幅宽24米，设计时速100公里，日通行能力3.5万辆机动车。

2000年11月，中国民航总局确定：天河机场为国际机场。

天河机场建设，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邓小平同志1990



1994年12月29日，天河机场举行首航盛典



年12月7日为武汉机场题写场名。江泽民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先后来工地视察，建设者备受鼓舞。

项目筹资与利用外资

天河机场建设工程宏伟、投资巨大，能在短短三年里顺利完成，除了中央和省里大力支持外，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利用外资的大政策。

机场建设（一期工程）最初（1989年）概算投资为3.4亿元，后来由于工程内容调增、材料设备涨价和外资日元汇率变化等原因，1991年调整为6.55亿元，1994年再次调整为10.55亿元，最终实际总投资为13.07亿元，建设期内平均每年投入3—4亿元；而这一时期，武汉市的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00亿元上下，财政收入为30亿元左右，城建资金还不足2亿元。显然，单靠城市财力兴建天河机场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同期还有汉口新火车站、长江二桥等多项大工程在建。

机场建设总投资13.07亿元中，国家民航出资3.6245亿元，

武汉地方筹资1.15亿元（包括省里按全省4000万人每人1元支持4000万元），其余都是依靠引进利用外资解决的。外资在总投资中占比约为60%。巨额外资助力机场建设的支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机场办成立外贷处，十几人专班担负利用外资工作。

机场建设利用外资，包括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

直接利用外资，为引进港资（视同外资）。根据香港新世界集团与武汉市政府达成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则意向，机场建设指挥部与新世界集团签订协议，新世界集团投资3.5亿元，由指挥部安排使用。港资回报按约定逐年偿付。新世界集团还全额投资机场专用道路工程4.5亿元，成立机场路发展公司，通过收取机动车通行费来还本付息。

间接利用外资，为利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即日元贷款）。在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和建设部支持下，天河机场作为第三



天河机场全封闭快速专用道路

批日元贷款项目，计划利用 62.29 亿日元，实际使用 53.5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4 亿多元）。日元贷款是一种带有援助性质的政府间贷款，由国家统借，地方使用并负责还款；贷款期 30 年，前 10 年为宽限期只付息不还本，利率 2.5%，有利减轻用款项目单位还贷负担。按照规定，日元贷款只能通过国际公



天河机场（一期工程）航站楼候机厅

开招标，用于采购“合格货源国”商家提供的材料设备和服务。外贷处在配合完成外资转贷和申办各种审批手续的基础上，先后与美、英、法、日、意、韩和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上百家投标厂商接触洽谈，成功签订合同 84 项，采购九十年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场专用设备、仪器仪表 7000 余台（套），车辆 140 多台以及大量建材，不仅满足了机场工程所需，而且提高了建设水平。如航管楼塔楼内安装的通讯导航技术设备，都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

武汉天河机场（一期工程）按期胜利建成，成为我国航空运输网中的重要枢纽，使民航机场和航线布局更趋合理，不仅有利于民航业发展，也对中部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为武汉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武汉，架设了更为宽广的桥梁。

机场正式通航营运后的 20 多年间，由于业务增长需要，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扩建。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4 月完成二期工程，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完成三期工程，拥有了 3 座航站楼。

2023 年 6 月开建第三跑道，建成后有望成为全国第七个拥有三条跑道的机场。飞行区等级早已由 4E 级上升为最高等级 4F 级，可以起降各种大型客机和空客 A380 特大型客机。旅客吞吐量 2009 年突破 1000 万人次，2016 年突破 2000 万人次，2019 年达 2715 万人次。拥有国内外航线 170 多条，通航城市国内 72 个、国际（地区）47 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机场，是我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2023 年 6 月 25 日，中国民航局批复天河机场“扩容”，高峰小时航班时刻容量从 42 架次提升为 55 架次。日均航班上限从 700 架次增至 1000 架次，航班时刻容量成为中部第一，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张智海，原武汉市城建委副巡视员，
1988—1998 年任对外经济管理处处长

江城绽放“格桑花”

◇ 侯伯云

人物名片：侯伯云，市政协委员，农工党洪山区工委副主委，武汉西藏中学副校长，湖北省楚天园丁奖获得者，全国教育援藏先进个人。

在我们学校的民族团结馆里，有整整一面墙的爱心形亚克力盒子，盒子里装满了小纸条，上面写着历届毕业生的离别感言。翻看这一张张小纸条，时常让我热泪盈眶。

我是一名农工党党员，也是武汉西藏中学的一名老师，执教“西藏班”28年，带过4000多名藏族学生。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是，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朵朵“格桑花”在江城武汉绽放得分外艳丽。

西藏孩子的“博侯”

举办内地西藏班，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培养优秀少数民族人才，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战略

部署。武汉西藏中学是全国首批内地西藏班（校）之一，每年都有近千名孩子远离家乡，从雪域高原来到武汉学习生活。

1995年，我从宜昌职教中心调到沙市六中西藏班（现武汉西藏中学），当起了藏族学生的“孩子王”。第一次前往沙市码头接来内地上学的藏族孩子时，普布从船上下来，吃力地提着一个蛇皮行李袋，我就想接过来，却遭到他的拒绝。沙市码头距离校区有近3公里路程，身材矮小的普布坚持把跟他个头差不多大的行李，连提带拖地拿到了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袋子里装有普布预科一年和初中三年全部的零用钱，共440元，这是临行前妈妈一针一线缝进袋中的。西藏中学70%的学生都来自农区和牧区，部分学生因家庭情况窘迫而自卑，这都让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如何让学生亲近自己、信任自己？为此我花时间自学了拉萨、山南地区的日常口语。当我操着一口熟悉的



农工党武汉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李运玲和她结对的孩子

乡音与孩子们交流时，他们很快就对我敞开了心扉。

渐渐地，我摸索出了一套与藏族学生相处的方法，即“严、爱、细”三字经教育理念。“严”，对刚来学校的孩子，我会带着其他老师一起，从吃、住、行等方面严格要求学生，养成好的生活、学习习惯。“爱”，把藏族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学生将老师当亲人，教育的成效就会事半功倍。“细”，工作一定要细，孩子都在成长年龄，远离父母亲人，只有把工作做细做深，深入了解学生想什么、做什么才能懂孩子。通过这个方法，藏族孩子们很快适应了在武汉的生活。

“老爹是我的恩人，不是因为他，我肯定考不上大学。”赤列江措是武汉西藏中学2016级的毕业生，考上大学前差点放弃学业回藏，我的劝导才让他回归人生的正轨。从此，我也成为赤列江措口中的“老爹”。高三时，他成绩不太理想，远在西藏的家长要孩子回家。我知道这件事后，将赤列江措叫到办公室，逐门为他分析各科提分的可能，专门肯定和鼓励了他。我对他说：

“就算所有人都放弃你，我也不会放弃。”重拾信心的他，一举考上浙江警官学院。

无论雪花飘飞还是夏日炎炎，我每天

都要巡查教室、宿舍、操场。早上我会准时来到操场、教室，与孩子们一起晨练、晨读；夜深人静时，我走进寝室替学生掖好被褥；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我也会守候在食堂。藏族孩子有偏食的毛病，我一边把菜分到碗里，一边解释菜的营养价值，并督促他们把饭菜吃完。

“体育课做动作，就跟我们藏族的锅庄一样美。”我总是这样开导腼腆的藏族孩子。我根据藏族学

生的特点，结合现代中学体育课程核心素养要求，把藏族歌舞元素融入到体育教学内容和过程中，创建了颇具特色的锅庄课、啦啦操等教学模块。每节课上，我和孩子们一起边唱边跳，并对他们的动作纠正定型，“藏式体育”成为学校一景。

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和学生一起团年，大年初一一起团拜；节假日，还不时把藏族孩子接回家过节。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陪着学生们，我们打趣自己为“36524部队”。有的老师一守就是三十多年，从黑发守出白发，青年守成老人。我们还戏称自己为“三无人员”：对家人陪得少，被埋怨无亲情；和朋友聚得少，被埋怨无友情；和恋人处得少，被埋怨无爱情。

2020年，白玛措姆高中毕业离校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博侯，如果没有您，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毕业，感谢您的关心和资助。我一定要像您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把爱带上，我会把民族大爱带回西藏的！”

“博侯”是孩子们对我藏语味的称呼，有着浓浓的亦父、亦师味道。在我的影响和推动下，武汉西藏中学的老师都成了学生的亲人。“爸爸老师”“妈妈老师”，在西藏中学时时处处都能听到这样的称呼。

在武汉有了新“家”

在内地，西藏孩子日常的生活和学习都能逐渐走入正轨，但他们毕竟幼小离家，所以导致一定程度的亲情缺失。虽然我总是督促孩子们多跟家里联系，但与家乡4000多公里距离，还是让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感到一些落差。

我1999年加入农工党。2012年3月，农工党洪山区工委扶贫讨论会上，我提议：“区工委和我们的党员能否资助一下武汉西藏中学的藏族孩子？他们远离父母来内地学习，有些学生需要外界帮扶才能顺利完成学业。”

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积极回应。这次会议后，农工党的爱心党员就开始与西藏中学孩子结亲结对。多年来，农工党武汉市委、洪山区工委在西藏中学开展十多次大型结亲结对活动，捐款捐物200多万元。一路走来，摸索出一套“亲情结对、亲情资助、亲情聚会、亲情交流、亲情走动”的“五亲”结对资助模式。

为方便筹集爱心资金，规范使用爱心善款，也为保护受资助者的尊严，农工党爱心党员在武汉西藏中学成立了爱心助学基金——“雪莲花”基金。每年都会有爱心捐款如涓涓细流汇入“雪莲花”基金。

2011年，德吉拉姆从西藏山南地区来到武汉。性格内向、家庭困难的她有点自卑，不太愿意与人交往，到校不久就哭着想回去。但在与汉族妈妈贺丹心结对后，德吉拉姆再也不闹着想回去了。她说，成为这个“新家”的一员后，不仅在异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没再为短缺生活、学习用品发过愁。在武汉家人的呵护和关心下，德拉吉姆也渐

渐开朗起来，脸上经常露出甜美的笑容，犹如高原的格桑花，盛开在青山绿水的武汉。

2018年10月，大学毕业的德拉吉姆来到武汉，来到贺妈妈家里，践行她许过的诺言：大学毕业，要再帮贺妈妈做一次家务，给贺妈妈洗一次脚。“妈妈这么多年关心我、呵护我、帮助我，我也算一个农工党的孩子了。等我有能力后，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肆虐，入职不久的德吉拉姆将一个月工资全部购买口罩捐给母校。

“你就是我的爸爸，以后我给你养老！”当听到资助了11年的孩子旦增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十分温暖。2000年，家庭贫困的旦增来到武汉西藏中学读书。由于父亲早逝，担心家中的母亲和奶奶无人照顾，他以砸坏学校路灯的方式激怒老师，希望能被送回家去。得知这件事后，我没有责怪旦增，而是与他谈心解开心结，并对他进行资助，直到他大学毕业。

2012年以来，200多名藏族孩子在农工党“五亲”爱心结对中有了新“家”。一句句嘘寒问暖，一件件温暖棉衣，一顿顿母爱大餐，一幕幕促膝长谈……无数温暖的画面，出现在武汉农工党员与西藏中学学生“五亲”爱心结对活动中。一群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藏族孩子，在汉族亲人的亲情关怀下，在“新家”的港湾里幸福地成长。

爱满江城

2018年，基于“五亲”爱心结对助学模式的成功开展，作为市政协委员的我提出《让每一个来武汉学习的新疆、西藏孩子在江城有一个家》提案，武汉市政协予以立案。由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协调，在相关部门

组织下，包括民进、民盟、民革、民建、九三、致公等民主党派在内的市政协委员与社会爱心人士，相继开展与洪山高中、武汉西藏中学、东湖中学少数民族孩子的爱心结对活动。

受此影响，武汉西藏中学、洪山高中等民族学校持续开展了“江城有我家”“洪山有我家”“湖北有我家”活动。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与武汉求学的少数民族学子，在武汉结下了别样的父子情、母女情。爱心不断在传递、在扩大、在升华，一幕幕超越民族情谊的大爱故事就此谱写开来。

今年开学我接待了一个家长，他叫扎西，是来送孙子上学的。十几年前，他送儿子来我校上学，毕业时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直到就业都没有忘记第二故乡湖北，没有忘记在湖北的老师和汉族亲人。那年林芝通麦发生泥石流，扎西接了几个受阻的汉族同胞到单位避险。遇险等待的车辆很多，扎西特别关注车牌是不是湖北的，是不是武汉的。他说对湖北家人一直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今年全家意愿高度一致地让孙子报考武汉西藏中学。

旺姆，是西藏山南农牧区的一名藏族女孩子，父亲没有工作，以打零工维持家里的简单生活。旺姆考到武汉西藏中学读初中，来校一段时间后，出现怕冷、脸部有白化现象。有位老师找到一个治疗体虚防脸部白化的食谱方子，学校老师每天轮番为她熬汤煲饭，一坚持就是四年，旺姆脸上的白化现象真的消失了。

毕业时，旺姆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本可以去北京上海读高中，但她毅然选择了



农工党洪山区工委向武汉西藏中学雪莲花基金捐赠 56 万元

回武汉西藏中学。并且，还鼓励弟弟也考到武汉西藏中学。她说：“武汉有我的‘家’，有关心和我的汉族‘家人’”。受女儿和与女儿结对家长的影响，前几年，旺姆的父亲开始创业，如今事业做得颇有起色，不久前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今，我们培养的藏族学生大多已成为西藏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毕业于我校的江勇西绕，被誉为雪域雄鹰。还有全国“三八红旗手”、西藏自治区广电局长燕红，全国汉藏文化交流使者、武汉市政协常委斯朗且增曲培，等等。他们和一批批内地西藏班毕业的青年才俊一道，正在国家和西藏建设的各个领域发光发热。

格桑花，西藏同胞的吉祥之花，本意为“幸福的花”，它将青藏高原与江城紧紧地连在一起，盛开时像彩霞般耀眼，像彩虹般绚烂。

“我本楚狂人” ——李白与湖北安陆

◇ 朱绍斌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诗仙李白一生游历大江南北，却常称自己为“楚人”，辽阔的荆楚大地曾与天性洒脱奔放的李白结下深厚的羁绊。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今湖北安陆，与唐高宗时宰相许圜师的孙女结为夫妻，隐居白兆山桃花岩，开始了以安陆为中心的十年漫游生活。安陆十年，李白创作了大量经典诗文作品，确立了“大济苍生”的人生理想。安陆成为李白的温馨家园、创作沃土。

安陆，吸引诗仙李白的“人文磁石”

“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是李白对安陆十年的形象总结。这里的“蹉跎”主要是指政治上没有建树，未能实现“安苍生，济黎民”的宏伟政治抱负。从李白在安陆创作

的大量诗文作品来看，他的感情、家庭生活十分美满，诗歌创作迎来第一个高峰期，可称“酒隐安陆，诗意十年”。那么，“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为什么慧眼独具，驻足涢水之滨的小城安陆？

观光说——秀美山川留住了诗仙脚步。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嵩游庐山序》一文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为讽谏汉武帝肆意嬉游、荒废国政，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虚构了楚王在云梦泽游猎的宏大场面，对云梦泽畔奇山胜景的描述精彩绝伦，读之令人神往。天性洒脱不羁、酷爱四海遨游的李白东游江东之后，沿长江溯江西返，走到江夏（武昌），兴之所至，扁舟北上，来到安陆。

唐代安陆是荆楚一带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称“贵如许郝、富若田



安陆白兆山李白石像

彭”“富商豪贾，尽居纓冕之流”，城池高峻，雄镇云梦古泽；人烟辐辏，文教昌盛；风光旖旎，名胜遍布，吸引文人士子流连忘返。盛唐状元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随州刺史刘长卿、古文领袖韩愈以及著名诗人杜牧、杜荀鹤、赵嘏、罗隐、郑谷等都曾揽胜吟咏。李白热爱这片山水，他的《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馆》一诗把隐居之地白兆山写得胜似仙境：“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形象诠释了安陆胜景对他的超凡吸引力。

爱情说——甜美爱情抓住了游子“芳心”。李白在荆楚腹地安陆停下漫游天下的脚步，最为深刻的动因应是许夫人的纯真爱情。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一路揽胜赋诗，在湖北江陵写下《大鹏赋》，一时文人雅士争相传阅。“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安州“郡督马公”对李白的才华大加赞赏，“一见尽礼，许为奇才”，李白诗名传遍安州。青春美貌的相门孙女许紫烟闺阁中读到李白诗文，倾慕有加，不由生出《关雎》之想。李白的才华、声誉，加之安州“郡督马

公”、著名道士胡紫阳等人的相助，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白那颗浪迹漂泊的心找到了停泊港湾。

求荐说——政治宏愿改变了诗仙生活轨迹。“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少年时即立志济苍生、安黎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一生始终不渝追求实现这一宏伟抱负。唐代安陆是一座政治富矿，这里是大唐王朝肇始之地。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名叫李昞，曾担任安州总管，李渊在州学就读，启蒙受业，与安陆学子许绍结下深厚友情。后来李渊父子建立唐朝，时任夷陵（今湖北宜昌）通守的许绍带领数州之地归附唐朝，被赐封安陆郡公。唐高宗时期，安州的政治影响达到巅峰，政治世家“许郝家族”的许圜师及其外甥郝处俊先后担任宰相，备受信任和重用。就婚相府之家，给李白增添了实现政治理想的巨大助力。

安陆，成就李白诗歌的“创作沃土”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安陆十年，是李白成家、成熟、成才、成名的十年。安陆，是李白由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名满天下的著名诗人的“摇篮”。李白安陆十年，留下约两百篇诗文作品，占李白存世作品大约五分之一。经过安陆十年的淬炼，李白将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风格融合，诗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李白安陆十年的诗文作品，按思想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为实现政治理想呐喊。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以拟人化手法描述人生理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

清一……”为实现宏伟理想，李白漫游四方干谒求荐，然而世道艰难，李白一腔报国之忱无人赏识。愤怒出诗人，李白诗篇展示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也流露出傲岸自负的个性。《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可视为李白为理想奔波的见证。

为真挚感情礼赞。李白为人豪爽大气、坦荡率真，或以诗会友，如杜甫、贺知章、高适、王昌龄等；或访道求友，如胡紫阳、元丹丘等；或以酒结友，如“竹溪六逸”“饮中八仙”等；或与地方贤俊之士交往，如安州贤士蔡十、廖侯、独孤有邻等；或与某些官员情投契合，如汉东太守、崔宗之……上至朝廷显贵，下至平民黎庶，概相交往。从他诗文记述钩沉，李白结识的人物有三四百之多，对他生平创作、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大好河山放歌。李白以安陆为中心，漫游祖国大好河山，足迹遍布长江黄河、塞北江南，壮丽的山河、秀美的风光奔来眼底，流向笔端。《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绶》《安州应城玉女汤作》《夏日诸从弟登沔州龙兴阁序》《襄阳曲》《岷山怀古》《太原早秋》《春夜洛城闻笛》等，都是李白漫游天下的行踪记录，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为心灵激荡高吟。李白安陆十年最重要的远游，就是“一入长安”之行。自开元十八年（730年）别妻离女前往长安，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无成而归。李白遭遇人生重大挫折，由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蜕变为饱经沧桑的忧愤诗人。激越的情感不断唤醒灵感，这是李白诗歌创作的爆发期，《日夕山中忽然有怀》《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忠实记录了李白坎坷的心路历程。

为炽烈爱情吟唱。李白平生浪迹四海，

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的爱情诗。《紫藤树》《赠内》《久别离》《寄远十二首》等，都可视作宣示爱情的“情诗”。集中反映李白与许夫人感情生活的诗篇是《寄远十二首》。如《寄远》其一：“三鸟别王母，衔书来见过。肠断若剪弦，其如愁思何。遥知玉窗里，纤手弄云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萝。写水山井中，同泉岂殊波。秦心与楚恨，皎皎为谁多”，远游在外，情牵故园，以夸张炽烈的语气表达真诚深厚的夫妻之情，反映与许夫人相爱相知相思的生活。

安陆，情融李白心灵的“幸福驿站”

唐代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的婚姻：“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与许夫人婚后居家安陆白兆山桃花岩，过着轻松愉快、诗情画意的生活。

许夫人是李白生活上的贤内助。李白志向宏远，大多时间在外游历。其中开元十八年（730年）到长安求荐，一去数年，所费不貲。如此空前的漫游生活，没有许夫人在经济上、情感上的支持，难以想象。免除家室之累、轻松洒脱的李白，才能创作出风格清逸、想象奇异、狂放恣肆的浪漫诗篇。

许夫人是李白坎坷人生道路上的“知音”。许夫人深知李白不愿受世俗羁绊，在李白三十岁那年，送别丈夫，让他西入长安寻求发展。李白游历数年，经历政治生涯的重大失败，心情黯然回到安陆，沉湎饮酒浇愁，许夫人都能耐心抚慰，给李白以理解和支持，为李白营造了温馨的精

神家园。李白以愧谑口气写下《赠内》：“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歉疚。“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诗人对家庭的依恋之情表露无遗。

许夫人与李白是志同道合的“诗友”。许夫人是名门闺秀，和李白才貌相当、志趣相投，常一起探讨诗文，是李白创作上的良师益友。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记载：太白作《长相思》一诗，有“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之句。夫人许氏看罢，道：“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太白听罢此句，爽然若失，自愧不如也。

李白对许夫人情深意笃。李白漫游远方，一去数月甚至数年，对许夫人和儿女十分牵挂。《久别离》中就写到：“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一别数年，诗人感觉离开结发妻子许夫人，时间是那么漫长，情不自禁思念家中的妻子和孩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白漫游太原，作《太原早秋》一诗，表达浓烈的思乡之情：“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从太原南返安陆途中，下太行山，经洛阳城，诗人写下《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一身兼有诗人、道者、豪侠气的李白更有儿女情长、侠骨柔肠。

安陆，深植李白诗歌基因的文化高地

酒隐安陆，诗吟天下。李白那脍炙人口的诗篇、洒脱不羁的个性、漫游四海的



央视纪录片《李白在安陆》开机仪式

豪情，在安陆留下深深烙印。李白文化渗入安陆每个角落，成为安陆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散发着独特光辉。

安陆成为历代名人争相题咏之地。自古以来，安陆就是文人墨客畅游观光、寻找创作灵感的理想之所。李白酒隐十年，更令安陆声誉鹊起。唐宋以来，文坛名家追寻诗仙足迹，或饱览安陆胜景，或题咏安陆风物，留下众多精彩诗篇。唐代王维、王昌龄、綦毋潜、刘长卿、韩愈、杜牧、杜荀鹤、赵嘏、罗隐、郑谷，宋代宋庠、宋祁、欧阳修、苏轼、曾巩、张先、秦观、廖世美，元代贯云石，明代王阳明、王世贞等饱蘸浓墨，礼赞安陆，留下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晚唐以来，安陆开始兴建纪念李白的建筑。唐代诗人赵嘏有诗《登安陆城西楼》（《登太白西楼》），表明晚唐时期太白楼已成为安陆标志性的人文景观。此后，经屡次修缮和重建，太白楼气势更为宏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有诗《浮云楼和赵嘏》。宋代，人们依白兆寺修建了太白堂。元代，白兆山李白旧游处兴建了长庚书院。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李白纪念建筑不断得到重建和修缮。当代改革开放以来，安陆致力整修李白遗址遗迹，1984年在城西金泉山兴建太白堂，由门楼、碑廊、太白堂、



吉尔吉斯斯坦客人赴安陆寻访李白踪迹

展览厅、游亭、水榭等组成建筑群，巍峨壮观。2011年，白兆山李白文化旅游区兴建全国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李白纪念馆；2012年，李白文化旅游区建设成为国家4A级景区；现在白兆山风景区正积极创建国家5A级景区。

李白对安陆的人文影响无处不在。在安陆，李白文化基因深植民间，李白情结浸润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如街道称太白大道，广场称太白广场，学校称太白中学，酒楼称太白酒楼，名酒为“李白宴”，名菜称“翰林鸡”，农家乐称“太白山庄”，民宿称“李白村”，皮影戏有“李白招亲”等等。安陆民俗也传承太白遗风，如敬酒三杯、饭到三杯酒等饮酒习俗，就是李白“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诗句的生动诠释。如今，李白文化更是深入安陆各个层面，中小学校引入李白文化乡土教材，“李白在安陆的民间传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李白文化的传播让安陆成为媒体宣传的新热点。近年来，先后有湖北卫视制作《李白在安陆》专题片，在美国加州电视台播出；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赴白兆山采访，制作专题片播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纪录片《李白

在安陆》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全国李白学术研讨会在安陆白兆山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四川、安徽等地李白研究人员共聚白兆山，传承与弘扬李白文化。新华网、凤凰网、百度网、新浪网等竞相向国内外宣传报道，吸引国内外学者和游

客纷至沓来，赏秀美山水，品李白文化，将安陆李白文化进一步推向全国世界。

关于李白文化的中外交流也日渐频繁。中国最先西传、在西方影响最大的诗歌是李白的诗。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吕福克说：“李白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诗人，也是属于全世界的诗人。他的诗歌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罗纳德说，李白是“被世界公认的中国伟大诗人”，其诗“容纳着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给人以无穷的美感享受”。安陆积极开展李白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李白文化，先后接待日本“中国古典诗歌访华团”“汉诗访问团”；接待李白出生地——吉尔吉斯斯坦访问团；接待美国《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德国最大电视传媒电视一台以及俄罗斯、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记者，到白兆山探访李白遗迹，向全球受众推介中国安陆李白文化。

朱绍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白研究学者，安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为民发声做心桥，扎根教坛育英才

◇ 常福曾

人物名片：常福曾，市政协委员，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餐饮旅游专业部主任。

我16岁从厨，19岁初出道即获得武汉市烹饪大赛冷拼雕刻组金奖，第四代“鲰鱼大王”孙昌弼先生爱才心切，将我收入门下，由此成为大师最小的弟子。36岁我获得“湖北省烹饪大师”称号，是当时最年轻的省级烹饪大师之一，一年后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担任烹饪专业带头人。2022年，我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对于我而言，这既是一项荣誉，更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进社区，下基层，“搭台唱戏”解民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是党执政的根基，力量的源泉。人民利益无小事。政协委员作为人民声音的代表，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围绕民生热点、痛点，排忧解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积极联系对口社区江岸区西马街江汉北路社区，深入了解居民群众的心事、心愿，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服务。通过深入走访和主动询问，我了

解到，一是随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越来越关注饮食健康，为了满足大伙儿对优质生活的追求，辖区居民希望社区能经常举办膳食营养讲堂或健康美食制作活动，多为他们普及健康养生知识；二是江汉北路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居民中老人与儿童比例较高，如何提升社区内老年人及青少年的幸福感，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一直是社区工作重点关注的问题，需要组织开展相应活动；三是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希望能为社区书法爱好者提供深入学习书法知识的平台，让大家能聚在一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针对这三个问题，我及时展开行动，以中国烹饪大师、省级非遗传承人的身份，运用网络技术开展非遗美食制作教学视频的投放工作，开展线上讲堂活动，传授非遗美食、营养健康美食制作方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居民生活技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2023年七八月，我通过“职”意成长、乐学暑假夏令营活动，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烘焙体验，为孩子们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丰富了假期生活，同时让孩子们体验到劳动的快乐，还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我联合社区组织开展“传承文化，翰墨飘香”书法交流活动。活动不仅增进了书法爱好者之间的友谊，还在社区营造了浓厚的书法艺术氛围，增添了社区文化气息，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区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常福曾参加社区活动

这些活动在社区内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我也因此被社区群众所熟知。江汉北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施敏说：“常老师，您现在都成为了社区男女老少追捧的‘网红’啊。”我还在疑惑不解的时候，她又说：“社区的群众都跟我说，您作为烹饪大师，立足学校平台，发挥职教资源和专业优势，为群众开展的这一系列活动‘投了老百姓之所好’，精准满足了他们的‘小’心愿、‘小’期待，他们很喜欢，也很感谢啊。”我认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只有通过走进邻里，了解民意，才能更好地纾解民困，服务群众。

访院校，连师生，甘为职教鼓与呼

湖北省是教育大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而职业教育水平则仅居于全国中游，与湖北教育大省、强省地位严重不匹配。作为教育界别委员，又来自于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我特别重视来自职教界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界的意见，积极为职业教育鼓与呼。

针对我省、我市烹饪教育中职、高职、本科三个层次的衔接不够通畅，造成人才浪

费，以及优质高等职业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问题，我提出《打通烹饪类专业中职生升学通道，完善湖北现代烹饪职业教育体系》提案。针对中等职业学校高水平技能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上存在困难，制约职业学校发展的问题，我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中等职业学校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的建议》提案。这些提案都基于扎实调研，集中反映了中等职业教育领域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领导决策起了较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近年来，我提出的一些提案得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2022年2月，副省长肖菊华对《打通烹饪类专业中职生升学通道，完善湖北现代烹饪职业教育体系》提案做了批示，提案转至武汉市教育局，该局及时做出了积极回应。2023年初，市教育局在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举行座谈，专项研讨了关于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衔接的推进问题。2023年1月7日，市长程用文与市政协委员协商座谈，我作为20位委员代表之一，围绕“打破制约高技能人才培养瓶颈，切实推进武汉市中高职衔接工作，加快技能强市步伐”作了专题发言。程市长表示市政

府将系统梳理、充分吸纳、认真落实，努力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武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好路子”。

秉初心，育人才，文化传承开新花

回想2012年，我舍弃年薪数十万的艳阳天行政总厨工作，走入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投身职业教育。十余年过去了，我丝毫无悔并自豪于自己的选择。结合在餐饮行业20余年的从业经验，我深感职业院校人才的培养决不能只侧重于技能培养，时代的发展需要的是“品德有尺度、技能有高度、文化有深度”的综合型技术人才。从教10年，我培养了省市各级劳模、技术能手16人，6人成为“湖北省烹饪大师”，4人成为“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面点大师”。

在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上，我带领的团队中有6名青年教师、53名学生获奖。在我的努力之下，学校烹饪专业群成为湖北省龙头。师生团队2019年参与世界军人运动会餐饮服务

服务工作，为各国领导人和运动员服务，受到一致好评。他们说：“你们制作的美食让我们体验了东方文化的魅力。”

2017年，作为餐饮高端装饰的糖艺尚不为人知，湖北省糖艺人才极端匮乏。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近乎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全省第一支专业的糖艺人才队伍，2018年，由我主导建设的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赛项湖北省集训基地成立。2021年，基地选



常福曾团队的非遗艺术品入藏武汉博物馆

手，我的学生鲁磊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选拔赛，入选国家集训队，标志着湖北省糖艺从此进入全国第一方阵。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国家集训基地落户武汉第一商业学校，这是该赛项全国六个基地中唯一落户在中职学校的，也是全省为数不多的世界技能大赛国家级基地之一。湖北省糖艺人才基本上出自这个基地。

我在本职工作中，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传承付诸行动。我带领师生团队联合武汉博物馆，创造性地以糖艺为载体，复刻国宝级文物《商凤纹方罍》《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江汉揽胜六方走马宫灯》，被该馆永久收藏。我们制作的文创巧克力，让观众体味了一把甜蜜。2021年，我带领师生团队创作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题材的大型糖艺雕塑作品《纪念二七大罢工》，并将作品捐赠给武汉二七纪念馆，作为我们向革命先烈的致敬和建党一百周年纪念献礼。

政协委员是党和人民之间的连心桥，既要将党和国家的精神及时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要将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反映到各级党政机关。只有清楚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准确反映民情民意，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也只有将人民的需求记在心里，才能殚精竭虑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捏塑作品《商凤纹方罍》



捏塑作品《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巧克力作品《江汉揽胜六方走马宫灯》



捏塑作品《纪念二七大罢工》

这些年履职经历中，我深深感觉到，深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责任感、迫切的使命感，是政协委员做好参政议政工作的基础，而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扎根基层，久久为功，为人民代言，为国家献策，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托付。路漫漫而道远兮，吾将不怠于吾之责。

企服市场“摆渡人”的创业之路

◇ 胡荣阳（口述） 鲁晓伟（整理）

人物名片：胡荣阳，少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监利商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市洪山区工商联第十届执委会执委，湖北省青年民营企业家联合会理事。

当夜幕降临，我习惯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远眺，视线越过车水马龙的雄楚高架，望向万家灯火，享受繁忙工作后的片刻宁静，思绪也不由地回到创业之初的时光。创业七年我白手起家，由最初的一方工位、六个伙伴，到如今成长为拥有近700人团队、7家分公司，累计服务近十万家企业、产值达十亿的一站式企服集团公司，在武汉站稳脚跟。很多人来公司调研，问我经营之道，我说无他，唯有真诚、不认命和对初心的坚守。

梦开始的地方

在大学里我就是别人眼中那个特立独行的人。2012年，我从贫困的监利乡下来到武汉这所现代化大都市求学。高考复读一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并非天赋异禀，并非善于考试和专注科研的“料”。平平无奇的我在人才资源密集的武汉，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想要在百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仅仅完成学业，拿上不错的GPA是不够的，如何很好地在社会立足，尽早地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才是关键。于是，大学我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兼职，看书。

我家里一直从事面点和熟食生意，秘制的卤味十里八乡是一绝，我从小耳濡目



2018年第一届普通合伙人授予仪式(左胡荣阳)

染,对营销充满了兴趣,填志愿报了市场营销专业。2012年,我参加校园营销策划大赛,不出意外地没拿到心仪的名次。事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表面上是方案比拼的失败,实际上是底层逻辑和实际经验的匮乏。怎么办?尝试尽可能多的兼职,阅读尽可能多的好书。

我的兼职从校园促销员开始,再后来,我发现学校后街人流量大,就拉着发小摆起了地摊。十一月的武汉已经降温了,我俩穿着短袖跑到汉正街找老乡进货,有时钱不够就把身份证压上。耗尽生活费是常有的事,已经记不清连续吃了多少碗热干面,但穿上那件用赚到的第一笔钱买的打折羽绒服时的喜悦历历在目。积累了一点资金后,我们又盘下校园旁一家奶茶店。签合同同时,发小说他的手在抖,其实我的心也在颤抖,终于安定下来了。

除去兼职,其他时间我就会泡在图书馆。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如果一年能读100本书,就超过90%的人。我算了一下,武汉有百万大学生,即使是10%也依然还有1万竞争者。我要成为百里挑一,

至少要读到200本书。大学期间我阅读了彼得·德鲁克、杰克·特劳特、菲利普·科特勒的管理营销学经典,还涉猎了文史、传记、哲学、财经等领域读物,结合各种兼职的实践,让我对成本控制、预算管理、促销玩法、盈亏平衡、投产复利等有了更深的理解。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并要求集团常务会的高管们每个月读完一本好书,并写下2000字感悟交我。

做企服行业的一股清流

2015年毕业季,我在先就业再创业还是直接创业上纠结。好在大四有半年实习期,我在企业找了份销售类工作。销售工作本就没有朝九晚五一说,为了业绩,我主动加班,利用晚上的黄金时间给客户打电话、发信息,即使周末也依然在工作。不出一个月,我成为公司的销冠,但老板给出的业绩提成点却很低。

我合计了一下,假若按照这样的轨迹走下去,每天精疲力竭也很难实现人生的跃升。如果等到成为高管后再来创业,身边的小伙伴也都有了家庭的羁绊,很难心无旁骛投入创业之中。为此我决心为未来拼搏一次,在做好市场考察、规划和资金准备等一系列工作后,我邀请同为好友的三人共同创业。

公司的启动资金10万元,全是我大学四年积攒的。成立的前一晚我们兴奋不已,三人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决定将创业公司取名为“武汉少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少博,取陶朱公范蠡字少伯的同音。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吴,退隐后经商成名,又三次散尽家财救济苍生,被后人尊为“商圣”。这里面有少博为名一方的宏愿,也有少博经世济民的理想。

湖北作为建筑大省，建筑行业一年接近2万亿产值，具有庞大的市场容量，所以我们选择从建筑企服这个细分领域开始做起。2016年3月，我们向学校创业基地申请了免费的办公位和六台二手电脑。由于基地一直都没有其他创业者前来，实际整个场地都专属于少博。我依然记得公司邀约第一位客户面谈的情形，尽管线上聊得不错，结果看到我们简陋的办公环境后借故离开。我们并没有为此泄气，我告诉大家：“凡事都会有第一次，少博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要害怕第一次。”

我给企业的定位是“做企服行业的一股清流”。清流是什么？就是要在当时良莠不齐、行标混乱的企服市场成为特殊的存在，就是用真诚去打动每一位客户、珍惜每一位客户，不轻易承诺、不欺瞒、保交付。建筑行业从业者普遍都是从业近十年的前辈，我们的优势就是足够真诚、足够踏实、足够谦虚。邀约客户，一次不行，就邀约三五次；客户出差了，如果事急我们会视情况跟到外地会面。我们承诺如果服务无法交付，无论什么理由都会全额退款。这份真诚以及坚持取得了客户的信任。2016年公司完成200万元营业额，员工也增至12人。

少博的“共同富裕”之路

在少博求生存、打基础、抢市场时期，创业伙伴付出了很多。经常结束白天繁忙的业务后晚上通宵复盘，这个习惯公司高管层依然保留。早期的团队大多是监利同乡，大家挤在离办公室不远的虎泉城中村内，公司仅用500元房租就解决了大家的住宿问题，小伙伴们笑称最期待的就是半月一次的公

司聚餐，可以改善伙食。那时不是公司不想给大家配上好的福利，而是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自己淋过雨，所以总希望能为别人撑把伞。饱尝创业艰辛后深知生活不易，也很感恩公司员工。2015年初我就开始思考“全员持股”。通过研究阿里和华为的合伙人模式，学习事务所、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结合我们的行业特点，2018年，少博开始施行合伙人制度。即员工入职满一年就自动成为少博合伙人，直接享受年底的分红。我们采用积分制，根据岗位贡献度设定了很多指标，根据每月工作成果进行计分，一年累计下来就是最终的股数，进而兑换成年底分红。

还记得年会上第一次为二十几位小伙伴颁发合伙人证书时的场景，他们笑着跟我说“终于熬出头了”，我内心既有感激也有心疼。2019年公司又增加了高级合伙人，给管理层及为公司作出重大贡献者更高的分红。在公司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少博没有员工，只有合伙人和高级合伙人。”5年来公司累计分红1523.12万元，很多一路走来的伙伴都在武汉买房安家，我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少博的“共同富裕”路。

随着公司的逐步扩大，我们也配套完善了各种福利。每天不重样的下午茶，每月的员工生日会，强制大家每月两次的团建活动。我们还开设了员工食堂，每餐两荤一素，供应中晚两餐……相比大型的集团公司，我依然觉得少博做得不够。在早起高管开会时，我习惯对大家讲的是：对于自己的组员，你觉得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你觉得他是兄弟，他就能为你遮风挡雨。近三年，公司逆势增长，人数扩充了5倍，分公司新增4家，产值翻了两番，一跃成长为湖北一站式



2022年4月少博集团贵阳分公司开业现场

企服领域的头部企业。2022年，我还获得年度“洪山好人”称号。

做华中一站式企服佼佼者

今年9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带领30多位产值过亿的企业家来少博集团总部做案例探访。正和岛老师提炼了一个标签：“解锁90后创一代7年300倍增长密码。”坦白地说，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强调产值本身，因为业态的不同，所体现出来的增长逻辑是不一样的。受全球大环境影响，单位产值下利润率降低，使得我们必须要在扩大产值上下功夫。每个省域前列的企服公司各有特点与优势，更多还是走着依靠关系与地域资源的老路，这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企服行业最终会从野蛮生长走向正规化、规模化。

我比较认同知名学者叶青老师在那次案例探访中送给少博的话：“服务即价值，真诚即结局，问题即业务，思考即出路。”为了比客户更懂他们自己，我们成立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从业务开发的逻辑来说，我们永远都是自己的第一个客户。每次遇到新

问题，自己先去研究着走一遍，跑通后也就成为了新的业务。我们不懂财税，就自己成立了创业发展部；我们在法律上栽过跟头，就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工程招投标需要ISO国际认证，我们就成立认证公司……每每遇到困难，我们就主动作为，将其转化为发展机会。我们也在2022年获得了湖北省经信厅2022年度“湖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严选服务机构”称号。

市场才是企业持续关注重点。最早成立建筑公司时，一没资源二没人脉，被前辈笑称是天方夜谭。在我看来“没有资源，就努力把自己变成资源”。当时建筑市场资质良莠不齐的乱象引发了各类社会问题，以及传统运营模式导致过度浪费，为此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打造了全品类资质，二是开放特许合伙加盟。邀约各地市州工程老板成为当地的分公司总经理，由他们聚焦前端市场，而我们以集团之力做好后端的管理与维护，形成良好的建筑平台共创模式。

运营过程中，我们不接触房地产开发业务，专注于“小而美”的各类招投标，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走适合民营建工企业发展的道路，七年实现年均10亿中标额。

据CBI建筑网综合报道，2023年第三季度，我们的建筑公司位列湖北中标百强排行榜第9位，这是对我们业绩最好的证明。由于在建筑企服领域积攒了众多口碑，我们才有实力通过十年“两步走”向“大企业”生态迈进。

“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便利”，这是少博最朴实的使命，无论少博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摆渡人”，为民营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夏口筑城与武汉双城格局的奠定

——纪念武昌建城 1800 周年

◇ 涂文学

公元 222 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王即位。孙权深知夏口对武昌“据之而存，失之而亡”的重要性，“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仅持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以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为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无可事者”“于是城夏口，都武昌”^[1]。称王建国之初，便在黄鹤山上修筑了夏口城。

夏口城筑于何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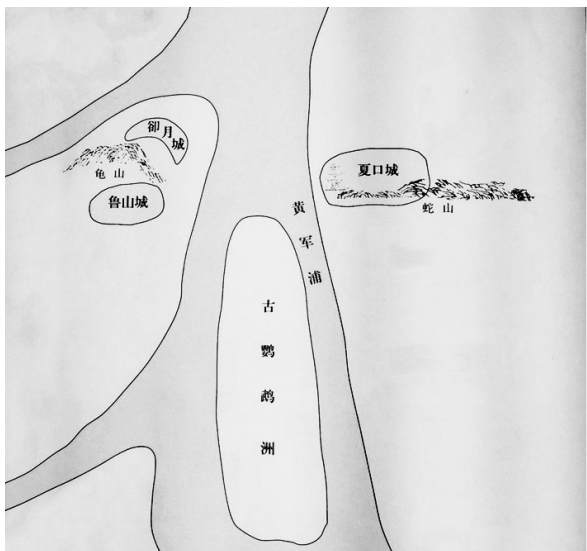
关于夏口筑城的具体时间，一般通行说法是吴黄武二年即公元 223 年。但检阅各种史书，我们发现，黄武二年并非唯一的说

法，夏口筑城年代至少有三说：

一为黄武二年（223 年）说。《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黄武二年，春正月，城江夏山”。又《元和郡县图志》卷 207，江南道三“鄂州”总序：“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一为魏黄初二年（221 年）说。《水经注》卷 35《江水篇》：“黄鹤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升势明远，凭墉藉祖，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一为吴赤乌年间（238—251 年）说。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 1《建置志》：“府



武汉地区汉末三国形势图（据武汉博物馆展示图）

城旧在黄鹄山，孙吴赤乌中筑，谓之夏口。墉山堑江，周二三里。对岸为沔津，故以夏口名。”

三说之中，为何黄武二年之说能为多数史家采纳？恐怕原因有二：一是最早记载孙权在黄武二年修筑夏口城的史籍是《三国志》，官修正史，可信度较高。修书年代又距三国时代不远；二是黄武二年为孙权称帝的次年，符合孙权“城夏口，都武昌”的历史逻辑。有鉴于此，笔者也愿从众，取吴黄武二年（223年）夏口筑城说。

夏口城位于今武昌蛇山东北隅，“依山负险，周回仅二三里”。城虽不大，但因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孙权对其极为看重，专设夏口都督，以重兵戍守，《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说：“夫夏口，贼之冲要，宜选名将镇戍之。”夏口城修筑后，孙权将武昌郡改为江夏郡并移治夏口，“孙权黄武二年城江夏山（武昌黄鹄山，即蛇山），移江夏郡治焉。时改武昌郡并入江夏郡矣。未改以前，郡领县三，既改以后，郡领县七”^[2]。这7个县是武昌、下雒、阳新、沙羡、竟陵、

云杜、邾，包括今武汉全部地区，鄂州市、咸宁市、天门市、钟祥市等鄂中、鄂东南等广大地区。由此可知，夏口城既是重要的军事城堡，也是地区行政中心城市。

由于夏口地位的重要，孙吴选派“夏口督”就十分慎重，可谓非宗室亲信不任。见于史籍的夏口都督共有10人，多为孙吴宗室。孙权在位期间，曾以威远将军孙邻为夏口中督。孙邻卒于赤乌十二年（249年）。孙权少子孙綝继位，以孙壹为夏口都督。孙壹有部曲千余口，平时屯田，春种秋收，对夏口地区的水稻种植有所推进。时孙綝专权，妄杀异己。太平二年（257年）六月，孙綝遣镇南将军朱异西入江夏。朱异军至武昌（今鄂州市）时，孙壹确知朱异是冲己而来，七月，率部曲千余奔魏。魏授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

此后，孙秀都督夏口。孙秀见恶于吴末帝孙皓。建衡二年（270年），孙皓遣兵五千，远奔夏口。孙秀惊疑，夜带部曲数百人奔晋。晋武帝授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孙皓大怒，宣称改秀姓为‘历’，另任都亭侯、武昌都督、鲁肃之子鲁淑为夏口都督。次年，原孙秀部将何崇，亦率所属五千人北奔投晋。凤凰三年（247年），鲁淑卒，子鲁睦袭爵，领夏口兵马。

最后一任夏口都督为孙慎。天纪元年（277年），孙慎率军北袭晋之江夏郡，掠千余家口后返回夏口。天纪四年（280年），晋平南将军胡奋攻占夏口。武汉地区开始属晋，吴以“夏口督”镇夏口的局面结束。^[3]

夏口城究在何处

夏口城于吴黄武二年（223年）由孙权建于今武昌蛇山似乎早已成定论，历代史地

名著如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顾炎武《肇城志》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地方志书对此均不持异议。但今人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石泉先生于2000年第4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古夏口城地望考辨》，一反前人陈说，提出古夏口城在今钟祥市而不在今武汉市，其主要依据有三：（一）由汉水、大别的相对方位，证古夏口不当在今武汉市一带；（二）由晋宋齐梁时的有关记载，亦可证当时的夏口城不在今武汉市；（三）从政区沿革证古夏口城不在今

武汉市。石泉先生这篇文章牵涉到了武汉城市起源的根本问题，果真如此，武汉城市史根基因此将发生动摇，武汉城市史也要重新改写。因此有必要花点笔墨与之驳难商榷。

细读石文，看似史料充分，逻辑严谨，但也并非没有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如石先生引《南齐书》卷15《州郡志》“郢州”总序一段话，通过夏口城因不滨临长江而证明其“古夏口不在武汉而在钟祥”的观点即是如此：

“郢州，镇夏口，旧要害也。吴置督将，为鲁口屯，对鲁山岸，因为名也。晋永嘉中，荆州刺史、都督山简自襄阳避贼奔夏口，庾翼为荆州，治夏口，并作地险也……义熙元年，冠军将军刘毅以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险要，控接湘川，边带沔、沔（泉按：值得注意的是，于此独不提长江），请并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夏口城据黄鹄矶……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泉按：此处又未提长江），应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

这里，石先生认为上述文字谈到夏口地望时，两处未提长江，说明夏口城并不建在长江边，不在长江边也就不在位于长江边的今武汉蛇山（亦即黄鹄山）上。但是石先生引用的这段文字中，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讲到了夏口城“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即滨临长江，对岸为沔水汉水入江口的地理方位。且文中又说到夏口具有“地居险要，控接湘川，边带沔、沔”的战略地位，这正是地处汉水之滨、鄂中腹地的钟祥所不具备的。



1883年湖北省城武昌内外街道总图



武汉全图 海云垒画馆光绪二年（1876）刊行（北京图书馆藏）

如果说，石先生上引《南齐书》史料对夏口城滨江地望尚显隐晦的话，那么，较之《南齐书》更早的《宋书》卷66《何尚之传》，对此却有明白无误的说明：“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隋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

《宋书》这段文字，关于夏口城“在荆（州）、江（州）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的地理方位，即处荆州—郢州—江州长江一线“中流之要”^[4]位置，可做荆、扬之缓冲，通过沔口溯汉水而上直达襄阳乃至汉中，且“既有见城，浦大容舫”。

这就有力的驳斥石泉先生夏口城只临汉水，不滨长江的观点。

另外，这则史料还谈到了湘州与夏口的关系，其中说到“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通过长江来进行的，与当下湖南长沙、岳阳等城市与武汉通过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经济一体化不乏相似之处，这也恰恰为仅临汉江、较为封闭的钟祥难以企及。

石先生认为汉魏之际夏口在钟祥而不在武汉的另一理由是“从夏口与武昌的距离较远，可知夏口不在今武汉市”。在这里，他引用了两则史料予以证明，一则为《晋书》卷73《庾翼传》记庾翼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拟率军北伐，“至夏口，复上表曰：‘……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是以辄量宜入沔，從镇襄阳’”。认为当时从武昌（今鄂州）到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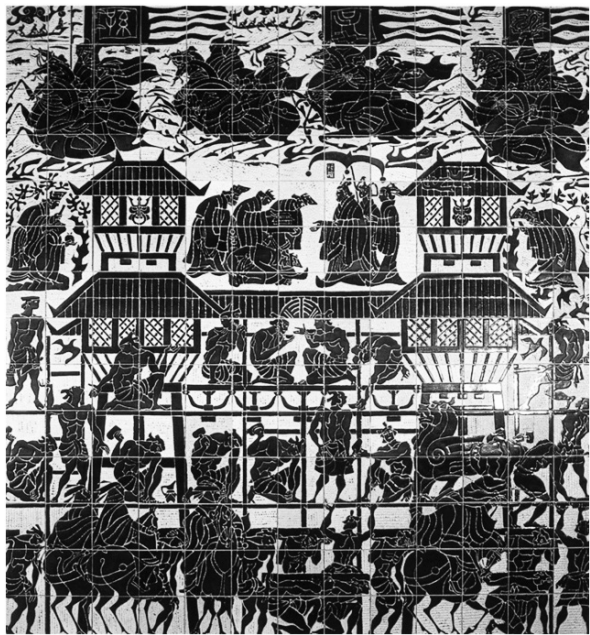
城一体的滨江城市特色。郤月城南倚龟山、北扼汉水入江口，陆地是军事城堡，水中是军事港口。黄祖为江夏太守时，在郤月城建大型水师基地，仅建安四年在与孙策的战斗中就损失战船 6000 余艘，其军港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夏口军港规模较郤月城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赤壁大战时，这里屯扎的周瑜水军多达数万。而且，夏口的军港还不止一个，鹦鹉洲、南浦和黄军浦皆是其重要军港。如鹦鹉洲：“由于这里四面环水，其与今武昌江岸间的夹江地带，尤便于舟船往来，东汉末便成为重要的军船出没之地。梁大宝元年（550 年），邵陵王萧纶为讨侯景，在郢州大选军器。湘东王萧绎怕其势力渐盛对自己不利，于是派王僧辨率领一万水师进驻鹦鹉洲，萧纶被迫出走武昌（今鄂城）。大宝二年（551 年），侯景派宋子仙夜袭武昌时，事先也是将大批水军埋伏在鹦鹉洲一带。由于此次偷袭成功，侯景的 13 万水军

乘胜西进，竟至‘联旗千里’”^[5]，足见港口规模之大。夏口、郤月港城一体化，显示了武汉城市水陆并存并重的城市空间布局特色，陆上城楼巍峨，江畔帆樯十里。是为武汉尤其是汉口闻名海内外的“船码头”之滥觞。

——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体系的建构。郤月城和夏口城不仅是军事堡垒和地方行政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作为港城一体的码头城市，城市功能分工一般是城—“安屯戍地”，港—“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如郤月城，东汉蔡邕《汉津赋》称颂它是“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如夏口城附近的黄军浦，《水经注》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湓回淤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得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6]明确指出其既为水军屯扎之所又是繁华商业码头一而二焉的商兵兼用功能。



武昌忠孝门一带，美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克拉普 1913-1915 年间摄



黄鹤楼内壁画《孙权筑城》 作者孙景波

王葆心曾以夏口和石阳以及黄军埔为例，对魏晋之际武汉城市的这种商兵兼用功能亦有详细论述。“由两汉而上，江汉大市场所在，余不得而知矣。其可考者，始于三国。三国时，此地为兵争之据要，夏口南北城名之移易，亦在是时。吾考《三国·吴志·陆逊传》，知是是时有石阳市。《陆逊传》有云：‘孙权北征，逊与诸葛瑾攻襄阳，瑾督舟师上进，潜遣军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将军周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据此，称石阳市盛，可见当日是地商场之况。按石阳，即东晋之汉阳，为汉阳始置县。在今黄陂地。然三国时便有是名。《魏志》称黄初五年，孙权围文聘于石阳即此。然则石阳今虽在黄陂，实则古汉旧地。其地既有城，又早见于三国时，是亦先有市镇，而

后有邑治，与今夏口同也。《元和郡县志》称，故城在县西二十三里。《黄陂县志》称，在今县北十五里，今名西城子，以图考之，地去汉口甚近。于方位，在今镇之之东北。在季汉朝，地属吴魏三国边境。今镇有黄陂街之名，沿县名名之。彼此之石阳市，亦沿石阳城镇名名之也。今之黄陂街，虽不必由石阳孳乳而来，然当时军用要地，莫如夏口；商用要地，则石阳也。其时汉水入江故道，与今日有纵横之殊。又联湖潴，訥沱夏诸水，其地势回环，故东晋又改名曲阳，宋为曲陵，皆写地势与水势盘曲，利于交通。故吴人在此用兵，必多具舟样。即平时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宜乎当日市场必建于此地。盖石阳市，与今武昌内隔以汉水、潇湘等湖，外又隔以大江，其势与南岸之夏口、殆与今武汉相倚之势同也”。这就是说，古代汉阳——石阳同武昌——夏口一样既是商业市镇（石阳市），也是行政—军事中心（石阳县—曲阳县—汉阳县），无能是吴人用兵抑或商人经商都十分看好其滨江临湖、舟楫便利的地



武昌宾阳门，比利时医生菲利普·斯普鲁伊特 20 世纪初摄



蛇山古鄂州城垣遗址

理位置（“故吴人在此用兵，必多具舟楫。即平时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而且是先有石阳市，后有石阳县，县之治邑是在市镇基础上扩展建立起来的。王氏同时指出，魏晋时夏口—石阳这种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格局，与近代武昌—汉阳（汉口）的政治—商业功能格局极其相似乃至趋同。至于魏晋武昌城外之黄军浦，更是“商地与兵地相维”之地：“典午南来以后，市场应在今夏口，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门外，鲇鱼套口一带。按《水经注》云：‘直鹦鹉州之下尾，江水滢曰淤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军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亦舟师之所会矣’。玩‘舟师所会’一语，知商船所屯傍岸必有极剧之市场。而水势回旋，内有湖，旁有洲渚，当是其遗。且是时鹦鹉洲犹在大江中，表里皆便。据《宋书·沈攸之传》及《通鉴》胡注，知当时有西渚可泊兵，有南堂可校射，是亦商地与兵地相维之证也。又《括地志》云：‘船官浦东对黄鹤山’，《读史方輿纪要》云：‘船官浦在黄鹤东，自昔为泊舟之所，有船官司之，因名’。皆南北朝时，商埠之所在，《小志》已记之。”^[7]

“东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绝当中央。将军气盖世。磊落惟周郎。得鲇鱼，沽美酒。

就黄州，谒苏子。谪向江湖动星斗。噫歔歔！人物销铄，尘迹荒凉。惟有江水，千古万古共流长。”^[8]岁月无情，长江有意。三国征战的硝烟早已散去，那城头岸边的鼓角争鸣、戈鸣马嘶渐行渐远，换了市声鼎沸，车马喧嚣；那曾经固若金汤的夏口城垣也已灰飞烟灭，成了历史陈迹；那曾经岌岌奇伟的黄鹤楼也是屡毁屡建，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只有黄鹤矶下那一江浊水依然奔流不息，滚滚东去，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沧桑世事，不尽乡愁……

注释：

[1]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湖广方輿纪要序》

[2] 潘新藻著：《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3] 刘玉堂主编：《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4] 《梁书·武帝纪上》。

[5] 刘玉堂主编：《武汉通史·秦汉至隋唐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6]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5《江水》。

[7]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8] 明·方孝儒：《黄鹤楼》，引自《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10《艺文志》（一）。

（本文图片提供：韩少斌）

涂文学，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顾问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中）

◇ 张笃勤

四、从《禹贡》大别山看先秦汉水入江口

既然《禹贡》大别山在汉末庐江郡安丰县西南，就是现在的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及其余脉，而不是汉阳城北郊的龟山，那么“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南回入江”又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本文在前面已有涉及，这里再对马徵麟、杨守敬的观点加以补充介绍。马徵麟在《长江图说》指出：“阳逻之山，俗曰十里长山，而汉水遂为山脉所遏，不能东下，折而南入于江，故《经》云‘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也。”^[1]从现在实地考察来看，

阳逻滨江一带地势较高，武矶头傲然屹立，迎流激浪，自古视为天险，在这里“不惟汉折而南，江亦自此迤南四百里，至武穴而始复东行。”^[2]在辨析汉口与夏口的区别时，马徵麟再次说明，今汉口东北，平原弥望，《水经注》称之为“滂滩”。滂滩内淝口、武口诸水浩渺无际，汉水注入其中，“入江之口曰沙口、曰水口，皆由西转南以入于江，阳逻长山一脉遏其前，与触山南迥之势相合，在今汉口东下三五十里，此必汉水入江故道也。”^[3]这就是《禹贡》所载先秦时期的古汉口。当今世人所知的汉口，是魏晋以后汉水河道上移的新名称，先秦时期原称夏口，是古夏水注入汉水后再分道南下的入江口。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夏水与汉水汇合后

再次出现两支分流，北支为主干，东至阳逻入江，谓之汉口，南下支流在今汉口入江，谓之夏口。马徵麟关于魏晋以前汉口与夏口并非一地的观点，与后面所列夏口、沔口、汉口同地异名的看法不同，这也提醒我们，夏水、沔水与汉水的分合及各自流路应当进一步研究。



汉末庐江郡安丰县与大别山方位图

杨守敬亦推测

先秦时期汉水自安陆东南趋平衍之地，绝宋河、浞河、潯河，至阳逻转南入江，汉代以后才演变到鲁山（今龟山）北麓入江，这在前文已有论列，在此不再重复。在当代学者中，扬铎、夏鹏章、张修桂等人观点大同小异，都认为先秦时期汉水主泓入江口当在武汉市以东、大别山支脉阳逻长山以西，后世才转至汉阳龟山北麓。依本文作者看来，这种观点既符合《禹贡》经典的本义，也符合先秦汉水入江的客观事实，恰好证明号称武汉城市之根的商代盘龙城曾是一座依傍汉水滨临长江的港口城市。

五、从鲁山城却月城夏口城看汉代三国汉水入江口

论证汉代至三国时期汉水主泓在汉阳鲁山（龟山）北麓入江，有三条重要佐证，就是武汉历史上著名的鲁山城、却月城与夏口城。^[4]

鲁山城或称鲁城，在汉阳鲁山，因上有三国时期东吴名臣鲁肃祠墓而得名，曾经为东吴江夏郡太守陆涣所驻守，此说为史学界所公认。但对于却月城地理位置，目前武汉史志学界将其置于龟山或龟山西南坡，这与多数经典文献记载相左。

譬如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山左有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羨县治。”^[5]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79荆湖北路汉阳军却月城条，搜罗援引多种重要史料称：

“却月城，《元和郡县志》云在县北三里；又《水经注》：沔左有却月城；又《荆州记》曰：沔口北岸临水处有却月城。”^[6]民国初年《夏口县志》卷1《舆地志》却月城条记载与上书略同。再如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131：“却月城与鲁城相对，以形如却月故。《荆州记》云：河口北岸临江



阳逻武矶头西北部



作者在阳逻武矶头东南部

水处有却月城。”^[7]可知却月城在汉水北面，大致位置杨守敬指为清末汉阳府夏口厅治所^[8]，与汉阳鲁山城隔汉水相对，共同构成汉水航道锁钥，又与长江对岸的夏口城形成犄角之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为西取荆州，报黄祖杀父之仇，曾先后多次派重兵攻打黄祖驻守的却月城。据《三国志·吴志·董袭传》：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楫间大继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继，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正因为黄祖所守却月城与鲁山夹汉对峙，为汉水入江口要塞，方才导致这次战争“孙权夺沔口，攻屠其城。”^[9]的惨剧。

汉代三国时期汉水从汉阳龟山北麓入江，除了通过江北却月城、鲁山城的方位加以确定外，还可以从孙权在江南所筑夏口城的对应方位得到佐证。

历史上夏口的地名在武汉三镇周转了一圈，先是指夏水入沔水（汉水）汇流在现今龟山北麓的入江口，继被孙权移作江南黄鹄山东北的军事城堡名字，称为夏口城。一千多年后，到清末民初时期，夏口又从江南返回到江北，被用作汉口地方建制名称，先后呼为夏口厅、夏口县。这里我们着重考察东吴孙权夏口城的得名。

黄武二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东北筑城，因隔江面对夏口，故取名夏口城。蛇山东北就在今武昌司门口一带，隔江对岸就是汉水入江口。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称：

“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10]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壙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羨县治也。”^[11]

南朝刘宋孝建元年新设郢州，大臣何尚之奏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12]于是将郢州治所设在了夏口城。

清代汉阳学人杨律撰《夏口考》一文，称：“汉口一水异名。蟠冢有二源，东流为汉，至大别入江为汉口，此本名也。西源为沔，迳葭萌关入汉，故又为沔口。华容县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夏水与沔水同至大别入江，故又为夏口，此夏口之所由名也。夏口、沔口，总是汉口。已上三说具载《禹贡》蔡注。……再考《一统志》：‘吴主孙权在武昌府城西黄鹄山筑夏口城，因对汉口，故取对岸名夏口。’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亦谓夏口戍。故唐史皆称鄂州为夏口。李白

《游郎官湖序》云：‘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刘长卿诗《自夏口至鹦鹉洲望岳阳》，皆谓鄂州。盖夏口本即汉口，自孙权取对岸名夏口，而汉口遂不复称夏口矣。如谓夏口非汉口，则所谓‘黄鹤山正对’何说也？经史子集在在可据，人所以纷纷聚讼者，或不知夏水与汉沔同入江也。”^[13]

民国《夏口县志》卷1《山川》所附《夏水考》一文，亦称“汉水或称沔，或称夏，故其入江之口或曰汉口，或曰沔口，或曰夏口。迨孙权筑城于黄鹤山北，名曰夏口，则夏口之称移至江南矣。”^[14]弄清鲁山城、却月城与夏口城的方位及其与汉水的关系，就可以明确得出汉代到三国时期汉水从汉阳龟山北麓入江的结论。

六、从战争攻守形势看魏晋南北朝汉水入江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依旧在鲁山与却月城之间东流入江，这从以下两场不同时期的战争的排兵布阵和攻守策略可以看出。

东晋安帝元兴三年春，东晋大臣刘裕派刘毅、刘道规、何无忌沿长江西上，消灭盘踞江陵的桓玄余党桓振。刘毅等进军到夏口时，桓振部将镇东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山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汉水北岸偃月垒（亦称却月城），三城隔江汉形成鼎立之势，相互应援。为了控制汉口，打通西上进军路线，刘毅攻打鲁山城，刘道规攻打偃月垒，何无忌遏中流策应，终于攻陷鲁山城和偃月垒，生擒桓仙客及孟山图。冯该败退石城。从这场

战争布局可以看出，当时汉水应在鲁山城北与却月城南流入长江。

再看南朝齐梁之际发生在武汉的另一场重大战事。据《梁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齐永元三年（501年）二月时任齐雍州刺史兼征东将军的萧衍自襄阳起兵东下建业，东昏侯萧宝卷使郢州刺史张冲守郢州城，又使房僧寄守鲁山，以阻止萧衍军队前行。萧衍命王茂与曹景宗为前军夺取郢州城，军至沔口，初战失利，各将领商议准备合力围攻郢州城，分兵以袭西阳、武昌。萧衍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为郢城人掎角。若悉众前进，贼必绝我军后，一朝为阻，则悔无所及。今欲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相会，以逼贼垒。吾自后围鲁山，以通沔汉，使郢城、竟陵间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连旗继至。粮食既足，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诸将皆曰“善”。萧衍于是命王茂、曹景宗帅众驻扎郢州城郊外，大败出城迎战的郢州刺史张冲，自己亲自带兵围困敌方把守的鲁山。三月，张冲死，由骠骑将军薛元嗣等接替守城。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数千人，与萧衍军队会合于夏首（即



汉阳龟山“大别山”摩崖

夏口)。萧衍命水军主将张惠绍、朱思远等游遏长江中，隔绝郢、鲁二城信使，实施久困之计。六月，朝廷遣卫尉席阐文劳军，传达尚书令萧颖胄等人的意见，谓萧衍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萧衍谓席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扼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萧衍不为所动，继续坚持围困战术。七月，萧衍乘涨水之机，派兵突袭位于今汉口东北的加湖，鲁山城、郢州城相视夺气，先后归降。从萧衍上述军事形势分析中可以窥知，汉口为萧衍志在必得的军事战略要道，就在鲁山北麓，为了掌控汉口，他在战后又“鞭驱十万人，版筑飞尘埃”，筑汉口城以守鲁山。^[15]假若当时汉水在鲁山西南、武昌鲇鱼口对岸入江，距离鲁山已远，在鲁山筑城根本无法起到扼守汉口，保障汉沔运道畅通的目的。

七、从名人名著看唐宋元时期汉水入江口

李吉甫及所著《元和郡县志》，可谓人名书。其中卷27汉阳县条称：“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其中明确无误的指明了当时汉水在鲁山（今称龟山）北，入江口河道与今天大体一致。

宋代相关记载亦证明，当时汉水主泓从汉阳大别山（即龟山）北流入长江。曾在湖北做官的北宋政治家兼学者夏竦，写有“大别山边汉水斜”的纪实诗句^[16]，这条记载尽管没有明确汉水是从汉阳大别山北

入江，但至少表明汉水是从汉阳大别山下入江的。假若汉水从汉阳城南入江，与大别山中隔汉阳城、凤栖山及当时混称郎官湖的莲花湖^[17]，距离大别山较远，记汉水从大别山入江不仅不符合地理实际，而且不如说从汉阳城南入江简洁明了。

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的王象之《舆地纪胜》，后人以其详赡分明，体例谨严，考证核洽，誉为南宋全国性总志中最善者。该书卷79荆湖北路汉阳军条所引宋代三条资料都与汉水入江位置有关。第一条，元祐六年李知《新汉阳学记》称：“汉阳于古为沔州，前枕大江，却负大别，汉水出于北，与大江合。”^[18]第二条，宣和年间汉阳知军蔡纯臣《寥廓台记》称：汉阳军城“据凤栖之峻峰，倚大别之巨麓，蜀江西来，汉水东入，山光水色，四环而交映。”^[19]第三条，熙宁中陈绎《凤栖经藏记》：“汉水东南和大江，夹江而城，左武昌，右汉阳，大别与凤栖相望。”^[20]上引前两条资料，都认定汉水是从大别山（鲁山）北入江，字明义确，无需申论；后一条史料中第一句话表面是说汉水由西北向东南流入长江，暗含的前提条件则是汉水入江口在汉阳城东北，不然，如何能说汉水与长江夹汉阳城，又何来“左武昌，右汉阳”的方位描述？

除《舆地纪胜》所提供的上述资料外，南宋名臣范成大《吴船录》也提供了当时汉水从汉阳大别山北入江的证据。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八月，范成大由四川乘船浮长江东归故里，中途曾停泊鄂州，启程时他由鄂州南楼之下驶向汉口过程中，远远看到“汉水自北岸出，青碧可鉴，合大江浊流，始不相入，行里许，则为江水所胜，浑而一色。”^[21]可知当时汉水入江口就在汉阳军大别山北，与当今汉水入江口大体相同。



《华夷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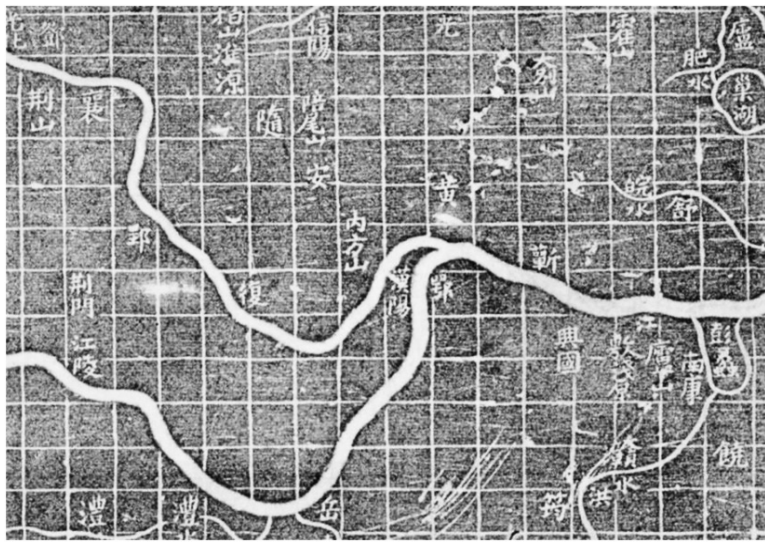
南宋时期汉水从汉阳大别山北入江，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汉阳知军黄榦向上司申请修筑汉阳城墙时的地形分析。他说：“惟汉阳地势，其北依山，其南瞰江，东西有湖，皆自然之天堑，无湖无江之处十之二三耳。”^[22]其中无一字提到汉水。如果当时汉水在汉阳城南汇入长江，或者从汉阳城与大别山之间今莲花湖流入长江，那将都是屏障汉阳的天堑之一，黄榦分析汉阳筑城地势，岂会忽略不提？再者，当时关于汉阳筑城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黄榦提出的“欲依郡治小山周围筑城保卫市井”，就是围着凤栖山筑城墙，具体计划“欲依郡治后小山向西筑至朝天门，即自朝天门斜取壕东门，过水军寨至南纪门，沿堤包筑，后接郡治后山，周回不满七里，则四面皆有城壁。”^[23]另一种是壕寨官提出的“欲只筑西北一面及大别山一带。”^[24]壕寨官提出这一方案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城北的大别山居高临下，俯瞰汉阳城中，若不将其与城墙连为一体，一旦烽火报

警，汉阳城将会遭到大别山矢石攻击。黄榦反驳说：“大别山去城中甚远，本军城之北又自有小山，足为捍蔽，城中人家尽在小山之下，大别之山岂能俯瞰城中？登大别之山，望汉阳之城，相去数百步，岂有矢石可以相及？”^[25]在黄榦与壕寨官所提两种筑城方案及各自所申述的理由中，周边地形山水都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但为何双方都无一字涉及汉水？而且从壕寨官所提

“欲只筑西北一面及大别山一带”的筑城方案看，也足以证明当时汉水不是从汉阳城与大别山之间进入长江，否则，汉水本身就是汉阳城北的天然屏障，没必要也不可能将城墙横跨汉水与大别山连为一体。

此外宋代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均将汉水入江口标注在汉阳城北，与今天汉水入江口位置相仿，其中《禹迹图》还把大别山标注在今河南光山、湖北黄州与安徽霍山之间，与当今大别山主脉所在区域吻合。

宋元鼎革之际，汉水从龟山以北入江，可从元军进攻南宋鄂州城的计谋及路线看



《禹迹图》局部

得出来。史载“宋咸淳末，蒙古将伯颜陷郢州，谋渡江。宋军分据要害，军不得进。其军将马福言，沧河口穿湖中，可从阳逻堡西沙芜口入江。伯颜乃进围汉阳，声言取汉口渡江，而乘间遣奇兵袭沙芜口，夺之。因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沧河，转沙芜口以达江。”^[26]当时元军人马从蔡店镇沿汉水而下，气势雄壮，有投鞭断流之概，包围汉阳城后，为了声东击西，既然能从汉口开挖水路进入汉阳城北二十多里的三沦湖及沧河，转进武湖、沙芜口以决战长江，说明当时汉水入江水道就在今汉口地区，其曲流弧顶与三沦湖及自德安府孝感县流入长江的沧河相距不远。假设当时汉水从龟山南或汉阳城南流入长江，顺汉水而下的元军可直接进入鄂州城外长江江面，还何需在军情火急的情景下开挖长距离水道，连通汉口西北的三沦湖及沧河水路，由沙芜口进入长江与宋军决战？

注释：

[1] 马徵麟《长江图说》，荆楚文库本，长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2] 马徵麟《长江图说》，荆楚文库本，长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3] 马徵麟《长江图说》，荆楚文库本，长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4]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之《古夏口城地望考辨》，认为鲁山城、却月城与夏口城均在今钟祥市，公元556年—557年间夏口名称南迁至今武汉市。此说与早先酈道元《水经注》不合，本文未予采纳。

[5] 陈桥驿《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4—805页。

[6] 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85页。

[7]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31，四库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册，第282页。

[8] 据民国《夏口县志·建置志》，夏口厅治即以前汉阳同知治所，民国初年为夏口地方检察、审判厅借用。从当时地图看，其位置在汉口大董家巷中段以南，江汉关道署西首。《汉口丛谈》作者范锴、《续汉口丛谈》作者王葆心均推断却月城在汉口。范锴写道：“余疑萧公、马骑、却月三城皆在今汉口左近，惜无从考耳。”见《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王葆心在引证了范锴上述判断后，又援引很多史料进行考订，认为“沔水经此（指汉口）入江，其流亦必环曲，此城在其左，正在今汉口，则此城缘汉口水与月湖水自成曲势，又与鲁山一线相对也，此确可信者也。”《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另据余家旌《新辑汉阳识略》卷1《舆地略》：“父老相传，六渡桥外旧题有却月城三字。”见《新辑汉阳识略》，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9]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第3546页。另据《湖北通志·古迹》黄陂县条，“南司州故城在县东，即古黄城镇。三国时刘表为荆州刺史，以此地当江汉之口，惧吴侵軼，使黄祖筑城镇遏，因名黄城镇。”据此，扬铎认为古代汉口及齐梁之际萧衍所筑汉口城必定在黄陂县无疑。

[10] 应为魏黄初四年，吴黄武二年。

[11]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5页，其中魏黄初二年，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作黄初四年；《南齐书·州郡志》记载略同。

[12] 《宋书》卷66，列传26《何尚之传》；又见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第3508页；

陈诗《湖北旧闻录》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3] 胡凤丹《大别山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又见《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591页；《湖北文征》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536页。

[14] 《民国夏口县志校注》上册卷1《山川》，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地方文献认为，夏水、沔水另有所指，并非汉水所能概括，因此夏口、沔口并不等同于汉口。各家对于夏口、沔口及汉口的具体方位，所指又各有不同。其中如清代学者马徵麟《长江图说》认为，古夏口与古汉口为两地，古汉口在沙口，古夏口即后来的汉口。他写道“盖古有枝、干二口：干而北者吾知其为汉口，枝而南者吾知其为夏口也。后乃枝、干合于一口，在昔人犹有知其为夏口者，而今人止知为汉口矣。”见《长江图说》，长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15] 据记载，萧衍曾先后两次在汉口筑城，后世一称梁城，一称萧公城。明朝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梁废城在大别山下。《方輿记》云：‘梁武帝筑城于此。’按《南史》：‘武帝自襄阳趋建业，邓元起屯大军于夏口，筑汉口城以守鲁山。’今大别山横顶城，即其旧基。萧公废城在郡城北五里。《图经》云：‘梁武帝初起兵，尝筑北城于汉口。武帝姓萧，其时未即位，人以萧公呼之。二城皆武帝城，一为起兵初筑，一为后筑。’”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76记载略同。明朝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与明朝万历《汉阳府志·艺文志》，分别载赵弼诗《梁武废城》及《汉口》各一首，其一：“孤城遗址汉江干，武帝兴师

立将坛。千载英雄零落尽，蒹葭风冷不胜寒。”其二：“茫茫汉水入江流，两岸芦花泊钓舟。梁武旧城无处觅，寒烟衰柏不胜愁。”《太平寰宇记》：“却月城与梁城相对。”已知梁城在鲁山（大别山）北坡，却月城应在汉水北岸。

[16] 王象之《輿地纪胜》卷79汉阳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3页。

[17] 北宋词人贺铸《郎官湖诗并考》：“今所谓郎官湖，占郡城之北，束于两山间，纵广百余步，固不足四顾而超然也，已知其非是。”可知当时曾将今汉阳莲花湖混称郎官湖。

[18] 王象之《輿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80页。

[19] 王象之《輿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81页。

[20] 王象之《輿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81页。

[21] 范成大《吴船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7页。

[22] 嘉靖《汉阳府志·宦迹志》。

[23] 嘉靖《汉阳府志·宦迹志》。

[24] 嘉靖《汉阳府志·宦迹志》。

[25] 嘉靖《汉阳府志·宦迹志》。

[26]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第3549页。

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武汉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本刊顾问

一位比利时医生镜头中的晚清武汉

◇ 麻建雄 孙庆力 韩少斌

编者按：

金秋时节，《武汉晚清影像》首发式在武汉中心书城举行，中国新闻社等媒体纷纷报道。这批120年前比利时医生拍摄的老照片一经披露，武汉摄影家协会主席麻建雄敏锐感知其独特价值，提议对之进行追寻解读，知名城市人文和老照片研究者孙庆力、韩少斌热忱参与，共同为武汉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原始影像资料。本刊特约三位作者撰文，披露其成书背后的故事。

2021年岁末，在“人文武汉”团队微信群里，旅英华人收藏家范榕先生发来了8张晚清武汉老照片，这是他从比利时刚刚编著的一本书《A Belgian passage to China

1870—1930》中用手机翻拍的。范榕从小生活于武汉，近年潜心搜集研究武汉历史影像卓有建树，也常常将其所获无私分享给家乡的人文爱好者。

这8张老照片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兴趣，我们三人很快达成共识，追寻这批颇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在范榕的帮助下，我们找到照片原片的所有者——比利时根特大学图书馆，获得全部原始影像文件。兴奋之余，我们发现这批照片包括原底片和数字扫描片共有1300余张，但大多没有整理注释，而且武汉、河南、北京等地的影像混杂一起，甚至部分呈现镜像反置。经初步判断，其中近400张涉及武汉三镇，这着实让多年来关注武汉历史和老照片研究的我们惊叹不已。



第一次呈现于世的汉阳高公桥影像

江城“清明上河图”

在疫情反复期间，我们三人多了一份使命感，查阅了相关史志文献，对比同期大量照片和地图，并通过照片拍摄的视角分析，采用测绘等技术平移和实地勘测的方式，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对其进行了整理解读，从而使这批照片的价值得以较大提升。

比利时医生的这批晚清影像，在迄今发现的武汉老照片中，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具备五大特点。

其一，珍稀罕见。全部照片与已出版的同时代照片不重复，很多是第一次呈现于世，有我们从未见过的景物，如：汉阳府衙、文庙、高公桥、月湖堤，武昌东岳庙内景、竖立原处的武昌洪山无影塔，汉口山陕会馆

内景、汉口城墙以及城墙上的后城马路等。

其二，全部高清。照片分辨率高，全部用当时流行的立体照相机拍摄，历经战争、灾害和变革，收藏120多年仍保存良好，实属难得。

其三，内容广泛。照片集中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10年间（1898年至1908年），武汉的自然风光、名胜建筑、政治军事、市政商业、民风民俗，包括跑马场盛况、新军训练、戏曲演出、救火、出殡等市井百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连环画式的展现，好似一幅江城“清明上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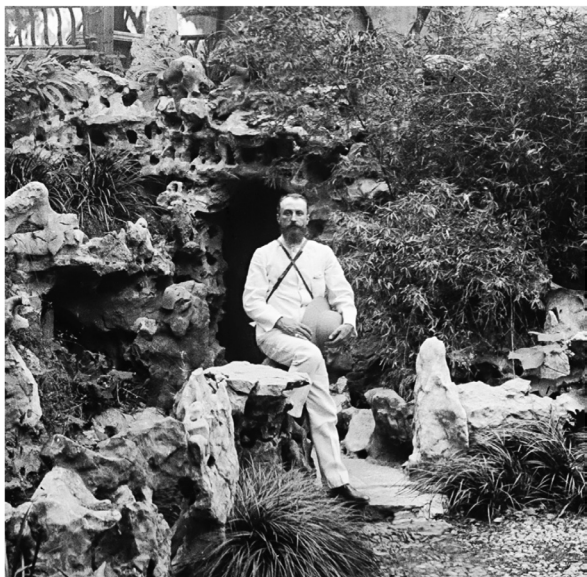
其四，数量巨大。通过整理解读，能够确定拍摄地为武汉的照片达400余张，是有史以来由一人拍摄数量最多的武汉晚清影像。这批照片补充了城市研究史料，丰富了文化记忆遗产。

其五，艺术性强。照片构图完整，主题明确，把自然风光、城市建筑记录与社会人文纪实有机结合，客观真实反映了时代面貌。

辛亥革命前夕，受相机笨重和观念制约，人文纪实摄影较少，内容以风光、建筑居多，而这批老照片不同于当时短期来华的外国记者、旅行家、传教士和领事馆、洋行人员拍摄的照片，颇有玛格南图片社布列松等摄影大师的风范，透着浓浓的人文情怀。

斯普鲁伊特兄弟

关于这批照片的摄影者斯普鲁伊特兄弟及其背景资料，我们正苦于《A Belgian



菲利浦·斯普鲁伊特医生在汉口山陕会馆花园

passage to China 1870—1930》一书的翻译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刘悦等编译的中文版《比利时——中国昔日之路（1870——1930）》。其中两个章节涉及京汉铁路的照片及介绍，为我们深入解读这批老照片保存下来的秘密、研究斯普鲁伊特兄弟的生平，提供了帮助和参考。

1898年，清朝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卢汉铁路合约，哥哥菲利浦·斯普鲁伊特受聘，于当年来到武汉为卢汉铁路项目提供医疗服务。他1869年出生于比利时根特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期大部分在布鲁塞尔度过，28岁以优异成绩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30岁来武汉，1908年11月2日因患胸膜炎，年仅40岁不幸在汉口去世。他在武汉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把生命的四分之一奉献给这座城市。

弟弟阿道夫·斯普鲁伊特比哥哥晚来中国7年，也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服务于北方汴洛铁路沿线。菲利浦病逝后，阿道夫将哥哥拍摄的照片、相机、设备及藏品运回

比利时保管，20世纪50年代初分别捐赠给比利时有关博物馆。阿道夫还曾担任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东方艺术委员会的副主席，1956年去世。阿道夫在武汉的时间并不长，有关武汉的照片应为菲利浦所拍摄，当然也不排除极少部分出自阿道夫之手的可能。

菲利浦的镜头，记录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转型的种种形态，再现了洋务运动和修筑卢汉铁路（后为京汉铁路）那段历史云烟，同时让我们领略了清末武汉三镇的山川风物、民生风貌，也看到了比利时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神情。

菲利浦在武汉的10年间，努力学习中文，对中国的事物有着极大的热情，并着手编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巨著，不幸的是他未能完成这项工作。他来汉初期，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汉阳铁厂旁的欧洲社区附近，每天都要乘坐划子越过汉江，然后穿过拥挤的街道，前往汉口北部的铁路办公室工作。他还定期沿铁路线来往于施工现场，为雇员医治。他还担任该区域内欧洲人的私人医生，并因为通晓汉语，是最早获准为中国人治疗的欧洲医生之一。



阿道夫·斯普鲁伊特在河南游览名胜古迹

“在业余时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菲利普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摄影、旅行是他的最爱。他从比利时带来一台欧美流行的箱式立体相机。这种相机利用两只略为分开的镜头，可以同时拍摄两张相片，再用特殊的观片器观看，得到具有立体感的影像。他亲自冲洗底片。这种相机采用玻璃底片成像，两张相片间有一空白竖条。由于相机较笨重，他常常雇佣中国人当助手，携相机奔走于武汉三镇，也在铁路沿线拍摄。

菲利普很少在两张相片间的空白竖条注明拍摄地点和时间，但他在给父母的大量信件中，描述了他的部分拍摄经历和对周边环境的迷恋。1899年5月11日的信中，他介绍了到武昌、汉阳的情况：“前天，我步行前往武昌，发现那里的街道比汉口更加宽敞、漂亮。我去参观当地小山上的美丽宝塔。还有一所高级军校，由德国前军官执教……汉阳面积要小得多，但是，如今扩张的地盘已经蔓延到老城墙以外。汉阳被河流环绕，河流主宰着城市的发展。”1900年11月24日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汉口的山陕会馆：“它坐落在中国城内，漂亮的黄绿色琉璃瓦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整个城市的天际线中脱颖而出……院内还有一座漂亮的两层塔楼，里面供奉着主文运的魁星……大殿往后走……有个金漆柱子撑起的大型戏台，柱子上黑色汉字格外显眼。”

“以图证史”的重要文献

作为民间武汉人文研究者和老照片的搜集爱好者，当我们刚接触菲利普尘封了120多年的这批照片时，就有把它们尽快整理解读出来的想法，使之尽快公布于世。

这种想法也许有些幼稚和大胆，仅凭



英租界工部局大楼（今江汉关处）前的挑茶工人



英租界河街的怡和洋行南楼和北楼

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及专业知识都有限，因此我们的工作注定是非常困难和艰辛的。我们按解读的难易程度，对照片进行了多次归纳分类，一张一张逐步攻克。在“人文武汉”友人们的帮助下，先把相关武汉的部分照片分辨出来。

解读这批照片是艰辛的，也是十分有趣的。对以人物活动为主的照片，凡背景有标志性建筑的予以标注，再通过照片信息找关联照片。对于以建筑为主的照片，有些建筑现今不存，就依据老地图、文献资料来佐证标注，有的甚至是对照相邻建筑的细部、

方位、远景等特征，或利用摄位作图分析找出其位置。

我们对照片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穷尽一切可能性。每天都在考虑：照片的地点在哪里，照片中的人物在干什么，周边环境怎么样，摄影者在哪里拍摄，他的行进路线如何？越到后来难度愈大，有时毫无头绪甚至临近崩溃。许多个夜晚，都在争论甚至“吵架”中度过，但我们从未轻言放弃。因为这是难得的学习机缘，我们也从中得到了收获和惊喜，这一过程让我们乐此不疲。我们不时有新的发现，也修正了一些原有的认知误差。

集家嘴码头全景照片得以确认。

照片中有6张不同时期拍的同一座码头。这是什么码头？汉口码头街巷多与江河垂直贯通，而这一码头街巷呈南北横向，比较符合老地图上集家嘴码头的特征。照片左侧房屋墙角有“怡心楼精制糕点”等字样，这是广告？还是就是怡心楼所在？我们不敢妄下定论。查阅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江



集家嘴码头

汉区志》第五篇第六节“沿革”中，有“集家嘴的怡心楼生产广式月饼最受欢迎”的记载。再仔细研读照片中的文字信息，码头木栅右侧有德商泰记洋行在集家嘴正街的信息；又比对相关照片，泰记洋行就在码头上街巷右侧，由此可以肯定这6张照片拍的就是集家嘴码头。再来比对过去收集的其他老照片发现，其实也出现过集家嘴码头的场景，只是原来没有证据将之和集家嘴码头关联在一起。

三德里是否1901年所建成为疑问。

有三张照片分别为骑马者、搬运工、挑土队伍，拍摄角度相近，摄位远近有别，但均出现一幢一楼为六券的同一建筑。从周边环境的变化看，三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有一定间隔。这一看似偏僻可骑马的空地，是什么地方？按摄影者常去推测，是否是其居住过的汉阳住所附近？出现铁轨，是否是其工作的京汉铁路附近？研讨多日无头绪，接近崩溃时的一句“气话”，却找到了比对方向。

通过海寿街附近的老照片比对，发现同为一处的可能性非常大。

不日到现场查勘，远景照片中，从左至右三幢主要建筑仍在原址，分别是海寿街2—4号、中山大道889—903号联排房、忠义村2号大楼。照片中海寿街门面房从无到有，说明两张相片拍摄时间间隔不短；而从摄位考虑，由南向北绘图判断，前左空地就是现在的三德里位置，中部前右为汉口

城墙经过处（今中山大道）。法租界通过所谓的拓界条约，在此越过城墙墙址向华界扩展，但条约是1902年底签定的，而照片中此时的法租界工部局还未建成，铁轨和挑土者可能是在填高城外的地势。由此，三德里是否1901年建成，就成为了一个疑问。

从8张线索照片到寻得全部照片，再到解读发现照片的内涵，我们爱不释手，夜不能

寐——这是菲利普留给我们城市的礼物。看着照片，我们的思绪，常会飞到120多年前龟山旁的那个欧洲社区，菲利普从这里带着那架箱式相机出发，奔走在武汉三镇。整整10年，他用热忱和坚守，用才智和汗水，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武汉清末影像。

历史影像是形象的历史，以其客观性与真实性展现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日常生活，同时也体现创作者独特的精神活动与艺术表现力，具有历史价值和特定艺术价值。通过影像资料研究历史文化，可起到图文互动、图史合一和以图补史、以图明史的作用，获取“一图胜千言”的独特功效。近年来，随着“以图证史”观念的强化和“影像史学”的兴起，对于以历史影像为核心的历史文献证据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研究。从图像角度研究历史事实与演变，是目前国际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在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和武汉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在一群热爱武汉这座文化名城的朋友的关心帮助下，这一批照片及解读



法租界新街（今海寿街）附近，照片中从左至右三幢主要建筑，今仍在原址

作为《武汉研究院文库》武汉城市历史丛书之一结集出版。

菲利普的这批照片，回到了他拍摄的大地，尽管岁月流逝，但它依旧鲜活清丽，依旧诠释往昔，无疑是研究武汉近代历史的重要图像文献。

这批照片能为各位读者提供一份素材，为武汉“文化强市”建设尽一份微力，我们就很满足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城市市民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自觉把人生追求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相连，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文化艺术的脉动，深刻反映新时代的巨变，讲好自己城市的故事。

麻建雄，武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市政协第八、九届委员，汉商集团原总经理；孙庆力，华中航运集团工程师；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公司经理

陈松林：黄陂籍院士打造水产种业“中国芯”

◇ 裴高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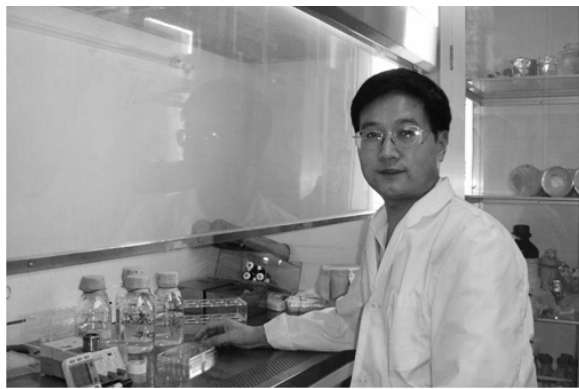
陈松林小传：

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1960年出生于黄陂县长堰镇（今黄陂区王家河街长堰社区），现为黄海水产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海水养殖生物育种与可持续产出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副主席、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国际著名刊物 *Scientific Reports* 和 *Mar Biotechnol* 编委。

无陂不成镇，黄陂育松林。

陈松林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从黄陂走出的首位院士，也是第八位武汉黄陂籍院士。

陈松林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水产养殖领域，潜心研究水产生物技术40



陈松林实验室工作照（2004）

年，从鱼类繁殖生理、配子冷冻保存，到鱼类性别控制和细胞工程育种，再到鱼类基因组资源发掘和分子育种，不断创新水产生物技术研究主题，取得了多项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并产生了6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陈松林深受海洋科技产业界欢迎，因为他采用现代生物技术，解决了海水鱼类养殖业中的诸多难题，建立了海水鱼类分子育种技术体系，培育出四个国审新品种，为海水鱼类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和良种支撑。

“旱鸭子”误入“水门”

1977年，陈松林从黄陂长堰中学搭上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头班车，考入上海水产学院（今上海海洋大学）淡水渔业专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其后，又两度分赴法国和德国进修，1998年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

“我是误入‘水门’的学人。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那时候服从国家需要，分配到了上海水产学院。说实话，我当时连‘水产’是什么都不知道，更没想到自己会取得一些‘小成绩’。”

陈松林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让他这个内地农村的“旱鸭子”享受高等教育，并将水产业定位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从事鱼类生殖生理和繁殖技术研究，践行学术报国梦。由于他将理论与科学实验有机结合，与“鱼”为伍潜心研究，工作不到5年就崭露头角：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的“葛洲

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的研究”成果，一举荣膺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急需高端科研人才，27岁的陈松林公派到法国农科院鱼类生理实验室和法国雷恩第一大学进修并转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鱼类内分泌学家 B.Breton 教授。他十分珍惜这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刻苦钻研，在一年多时间里，圆满完成大鳞大麻哈鱼促甲状腺素分离与纯化的研究课题。法国导师认为，他的研究成果达到法国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允许他回国后撰写博士论文，承诺资助他1990年再返法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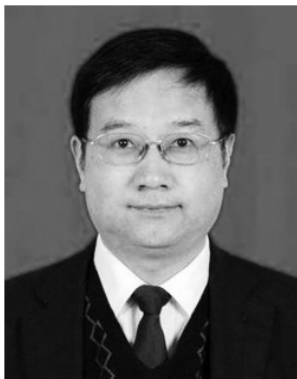
1989年5月，陈松林学成回国之后，全身心投入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作为研究团队的骨干，他完成了淡水鱼类精液、胚胎冷冻保存的课题研究；作为主持人，他完成了“草鱼垂体生长激素分离纯化、单克隆抗体制备及 ELISA 测定技术建立”等6个项目的研究工作——这项成果获1996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年，陈松林因故未能按时前往法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已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但他认为自己虽有聆教国外顶尖科学家的经历，却没有受学国内业界翘

楚的经历，遂于1996年师从中山大学林浩然教授

（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攻读在职博士学位，从事淡水鱼类分子内分泌的课题研究。1998年12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陈松林受学林浩然



科学家的责任就是潜心研究，多发明，多创新，造福人类贡献自己的能与智慧。

陈松林
2021年11月27日

2021年11月27日，陈松林当选院士后手书感言



2021年11月，陈松林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0周年庆典演说

院士期间，德国同行发来邀请，他于1997年3月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再赴欧洲，在德国开启了第二次海外求学之旅。3年间，他承担完成了有关鱼类干细胞培养和基因工程的课题研究。在与欧洲一流学者的交流中，他关注国际学界的研究新动向，谋划回国后采用基因技术培育抗病鱼类优良品种的思路。

从淡水鱼“游”向海水鱼

2000年，陈松林得知农业部在黄海水产研究所组建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开放实验室，毅然放弃国外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待遇，主动回国选择到黄海研究所工作，被所长唐启升院士聘为该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同时，黄海研究所为陈松林专门成立海水鱼类细胞和基因工程学科组，他将淡水鱼类精子冷冻保存技术应用到海水鱼类上，人称从淡水鱼“游”向海水鱼。

国内外不同研究环境的历练，唐启升、林浩然两位院士的指导，以及聚集在陈松林周围的精英团队，促使我国水产生物技术领域的一颗新星，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冉冉升

起。陈松林带领团队协力奋战，成功解决了花鲈、大菱鲆和半滑舌鳎等10多种海水鱼类精子冷冻保存技术问题，建立起精子银行。

在进行胚胎干细胞原代培养的那些日子里，陈松林经常一人通宵达旦做实验，经过100多天奋战，成功建立我国首个鱼类胚胎干细胞系——花鲈胚胎干细胞系。随后，他又相继申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863项目的支持，带领团队先后建立真

鲷、牙鲆、大菱鲆和半滑舌鳎等海水鱼类细胞系20多个，成为国内外建立鱼类细胞系最多的学者。

海归20多年里，陈松林领衔建立了海水鱼类精子和胚胎冷冻保存的技术体系，促进了我国海水鱼类种质保存、遗传育种和苗种繁育的发展；发明了鱼类胚胎细胞分离培养方法；克隆了鲆鲽鱼类抗病和性别相关功能基因60多个；率先提出了海水鱼类抗病分子育种的技术路线；发明了牙鲆抗病基因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培育出我国鲆鲽鱼类第一个高产抗病新品种——“鲆优1号”牙鲆。

同时，陈松林还发现了国内第一个鱼类性别特异分子标记——半滑舌鳎雌性特异AFLP标记，建立了其性别鉴定的分子技术，找到了雄鱼比例高达80%的原因，创建了高雌苗种制种技术，将雌鱼比例从20%左右提高到40%左右，解决了限制产业发展的雄鱼比例过高的难题，引领和带动了我国20多种鱼类开展性别特异分子标记筛选和分子性控研究，推动了我国水产动物性别控制的研究进程。



2009年，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接见陈松林

在同事眼里，陈松林是一位治学严谨、不知疲倦的学者，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他认为，科学就是造福人类，作为一位水产科技工作者，就是要瞄准水产业存在的重大问题，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创新性研究，为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渔业科技进步提供动力。

破译首个鱼类基因组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松林一以贯之研究水产生物技术，填补了诸多空白，取得了多项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突破了难以逾越的难关。作为第一完成人，他主持完成了“海水鲆鲽鱼类基因资源发掘及种质创制技术的建立与应用”成果，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完成了半滑舌鳎全基因组测序，发现了21000多个基因。这是全球范围内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第一种鲆鲽鱼类，同时也是国内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第一种鱼类。”继而，他一举摘取了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也是我国水产渔业领域5年间唯一荣获此奖的成果，

产生了6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陈松林著《鱼类精子和胚胎冷冻保存的理论与技术》，作为我国在水产动物种质低温保存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汇集了他在相关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20多种鱼类精子冷冻保存技术方法、淡水和海水鱼类胚胎冷冻保存的技术方法和最新成果。同时，也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鱼类低温生物学的理论、鱼类精子和胚胎的生理特性、冷冻保存的原理和技术方法，以及鱼类冷冻精子库的建立、维持和应用技术等。

陈松林缘何执着于研究我国鱼类基因组？这是因为半滑舌鳎是我国重要名贵海水养殖鱼类，其生长快速、适应力强、味道鲜美，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但是，半滑舌鳎雌性比雄性生长快二至四倍，雌性个体可达到一斤多，雄性个体只有二至四两。渔民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养殖一年多的雄鱼如此“矮小”又比例过大，卖不出价钱非常伤心。因此，严重影响了养殖积极性，

陈松林缘何执着于研究我国鱼类基因组？这是因为半滑舌鳎是我国重要名贵海水养殖鱼类，其生长快速、适应力强、味道鲜美，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但是，半滑舌鳎雌性比雄性生长快二至四倍，雌性个体可达到一斤多，雄性个体只有二至四两。渔民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养殖一年多的雄鱼如此“矮小”又比例过大，卖不出价钱非常伤心。因此，严重影响了养殖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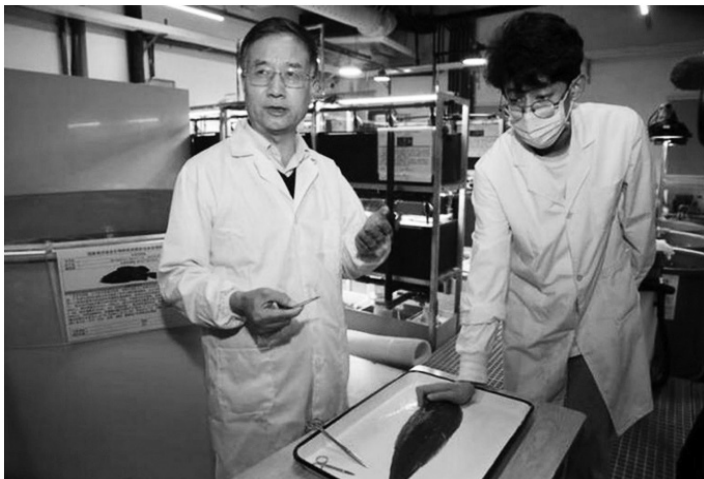
2021年9月，陈松林在第四届全球水产养殖大会作学术报告

限制了半滑舌鳎苗种的推广和养殖产业的发展。

“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从黄陂农村走出来的陈松林认为，产业的需求就是研究方向，渔民的难题就是研究课题。他深深懂得，基因资源是进行良种培育、水产养殖和病害防治的重要物质基础，谁占有了水产基因资源，谁就抓住了发展的先机。于是，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培育全雌或高雌率的半滑舌鳎苗种，成为他的主攻目标。

陈松林率先发起并联合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及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内外科学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种比目鱼类、我国第一种鱼类——半滑舌鳎全基因组测序和精细图谱绘制，使我国在海水鱼类基因组研究中走在了国际前列。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和比较，他进一步率领团队筛选到半滑舌鳎雌性特异微卫星分子标记，发现了雄性决定基因，阐明了其性别调控的分子机制，揭示了生理雄鱼比例高达70%~90%而雌鱼比例只有20%的形成原因。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Nature Genetics上，实现了我国水产渔业领域在Nature Genetics发表论文零的突破。继而，发明了分子标记辅助性别控制和高雌苗种制种技术，将生理雌性鱼苗比例提高到40%以上，养殖产量提高30%以上，推动了半滑舌鳎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率先突破了人工雌核发育难关，发明了人工催产和异源冷冻精子诱导雌核发育等一系列方法，培育了雌核发育群体，从而为半滑舌鳎良种选育提供了技术手段。

陈松林如是说：“我们后来又建立了半滑舌鳎基因编辑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将雄性决定基因敲除以后，发现有一些基因



2021年11月，陈松林在黄海研究所实验室

敲除的雄鱼苗，长得和雌鱼一样大，从而突破了半滑舌鳎雄鱼生长慢、个体小的问题，不仅为养殖半滑舌鳎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和途径，同时为其他海水养殖鱼类提供了技术借鉴。”

在陈松林看来，自己的发明成果，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敢于使用这项新技术，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科技成果转化如何走好进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是完成这项工作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他一边进行创新性研究，一边进行成果推广，主持承担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半滑舌鳎高雌性化苗种规模化培育技术中试与示范”。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技术成果通过反复试验，开始在多家水产养殖公司推广应用。近年来，在河北唐山一家公司实现了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高雌受精卵和苗种占到全国的80%左右。正是他率领团队与水产企业竭诚合作，提高了养殖产量，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了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的完美结合。

陈松林进一步坚信：科学技术的最终目标是造福人类；科研成果只有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才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2018年，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左）、院长周济（右）祝贺陈松林荣获中国工程院最高奖——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通过一系列攻关，批量发掘海水鱼类抗病、生长和性别相关基因和分子标记，共发掘了30多种海水鱼类的多态性微卫星标记4000多个，为海水鱼类种质鉴定、性别控制和良种培育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

牙鲆是我国另一个重要海水养殖鱼类，但它在养殖过程中病害非常严重。陈松林率领团队开展了牙鲆抗病分子育种新技术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培育出我国鲆鲽鱼类第一个高产抗病新品种——鲆优1号牙鲆，在山东、福建、天津、河北和辽宁进行了产业化示范养殖，推动了我国牙鲆种业的发展，表现出良好的养殖潜力和推广前景。

“蓝色粮仓”再冲浪

我国是渔业资源大国，规模化养殖的鱼类种类已达60多种，但几乎所有养殖品种都会受到疾病威胁。为实现鱼类绿色养殖

业发展，又不能使用抗生素，所以培育抗病、高产的优良品种成为产业急需，这也是陈松林只争朝夕科技创新的内在因素。陈松林说：“传统育种技术难以培育出抗病高产良种，所以我们在完成基因组测序的基础上，研制出我国首款鱼类抗病育种基因芯片‘鱼芯1号’，并基于其基因分型结果和牙鲆抗病基因组选择技术，开展了抗细菌病良种选育，育成两个高产抗病鲆鲽鱼类新品种。”

此外，陈松林团队还与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合作，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吉富罗非鱼上，培育出抗病高产型罗非鱼新品种“壮罗1号”。“壮罗1号”与普通吉富罗非鱼相比，抗无乳链球菌侵染能力平均提高25.57%，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9.19%，生长速度平均提高12.06%，适宜在广西、广东、海南和云南等省区养殖。

陈松林的创新成果，近年不断问鼎国家科技大奖，成为黄海研究所的响亮品牌。2012年，荣获第四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17年5月2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创新争先奖励大会上，一举夺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2018年5月30日，他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得主——这一奖项受中国工程院委托，由光华科技奖励基金会设立、中国科协学会组织评选，每两年评选一次，主要奖励做出重要贡献、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工程科技专家。

此外，陈松林主编出版专著四部，发表研究论文400多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SCI论文180多篇；获授权发明专利36项，其中第一发明人30项。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陈松林十分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学术团队，



2021年4月，陈松林夫妇回黄陂老家看望父亲

他认为，鱼类基因组测序相较哺乳动物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有大量空白需要探索，需要更多具有科研热情的人参与其中。所以，他指导学生投身科研，已培养了33名博士生和60名硕士。

在陈松林看来，种苗就是水产业的“芯片”。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水产种业已进入发展新阶段，产业聚集效应不断增强，“良种养殖、绿色发展”的观念正深入人心。

今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湛江时，视察了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提出建设“蓝色粮仓”：“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湛江为加快开发特有鱼类品种硃洲族大黄鱼，5月10日迅速成立了硃洲族大黄鱼研究院，陈松林欣然受聘担任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研究中心首席专家。5月14日，他为研究院揭牌，正式启动“硃洲族大黄鱼种质资源开发及繁育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科学家的责任就是潜心研究，多发明、多创造，为造福人类贡献自己的能力

与智慧。”陈松林上任后表示，他将会同有关专家和企业共同努力，力争3年内完成硃洲族大黄鱼的育繁推一体化构建，实现大黄鱼的深远海规模化养殖。同时，继续加强海水鱼类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保存，挖掘优异种质基因资源；加强东星斑、金鲷和高体鲷等重要海水鱼类苗种人工繁育和工厂化育苗技术的攻关，力争突破苗种的批量化生产。

5月20日，陈榆林在2023年粤港澳海洋合作发展论坛院士论坛上，就共建“蓝色粮仓”提供智慧。6月19日，他又风尘仆仆赶往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水产品交易中心，为“海南省陈松林院士工作站”揭牌，启动相关项目。

悠悠盘龙根，殷殷木兰情。

作为生长于木兰山麓的黄陂游子，陈松林常回湖北考察、讲学及探亲、访友。他多次到华中农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所作《鲮鱼基因组和遗传育种研究进展和展望》报告引起共鸣。今年新春，他专程回母校长堰中学看望恩师，勉励新一代校友努力学习、立志科学报国。

陈松林说：“当选院士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一份责任，现在赶上我们国家打好种子翻身仗、壮大水产种业‘芯片’的大好时机，让我感觉到今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裴高才，武汉市黄陂区委统战部原调研员

辛亥将军开发的大陆里与多闻里

◇ 田联申

城里人似乎是没有故乡、没有家园的。如果说有，那就是他青少年时期居住的街巷和因成长而熟悉的街区。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度过的。

大陆里原是希昌里

小时候住在大陆里，听老人们说这个地方原来不叫大陆里，是经过转手成为大陆银行的资产后才改名的。查阅 1990 年出版的《武汉地名志》，对大陆里的描述只有一句“20 年代建房成里，始名不详，后为大陆银行所有，改名大陆里。”

大陆里原名叫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心

里萦绕了很多年，一直到 2013 年，在“人文武汉”团队的合作下，谜底才慢慢揭晓。

2013 年参与编写《徽章上的武汉》一书，我在侯红志《督军证章与萧耀南督鄂》一文中发现了线索：“刘歆生将前沿六渡桥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后抵铁路边（今京汉大道），总计 3 万余方地产贱卖，石星川在上面建有吉星里，蔡汉卿（将军团八大将军之一）建有希昌里，还有李春萱的震旦中学（注：在大陆里民主街对面）和刘佐龙的八元里。”这“3 万余方地产”正是大陆里所在区域，希昌里疑是大陆里前身。

“孤证不立”。恰在此时，“人文武汉”网友徐望生提供给我一份高清版 1930 年《武



1960年，作者母亲、弟弟与表哥在大陆里15号门前

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武汉历史地图集》虽有此图但不清晰），在今大陆里的位置，看到了“希昌里”三字，因此可以确定大陆里的前身是希昌里。

蔡汉卿（1882—1952）又名蔡希圣，湖北沔阳人，辛亥元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炮兵排长蔡汉卿向湖广总督衙门打响了第一炮，故称“蔡一炮”（孙女为台湾地区著名歌星蔡琴）。希昌里，不



夏口县知事公署函

知是不是取蔡希圣中的“希”与昌盛中的“昌”合起来，为他建的里分起名？

希昌里又是怎样变成大陆里的呢？

据武汉票证收藏家刘汉桥考证，希昌里建成不久，蔡汉卿将里分抵押给大陆银行贷款。到期，蔡未还款或者说蔡贷款时就没有考虑还款，将抵押的房子变现。1929年1月，夏口县知事公署将希昌里判给大陆银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因涉“逆产”问题而难以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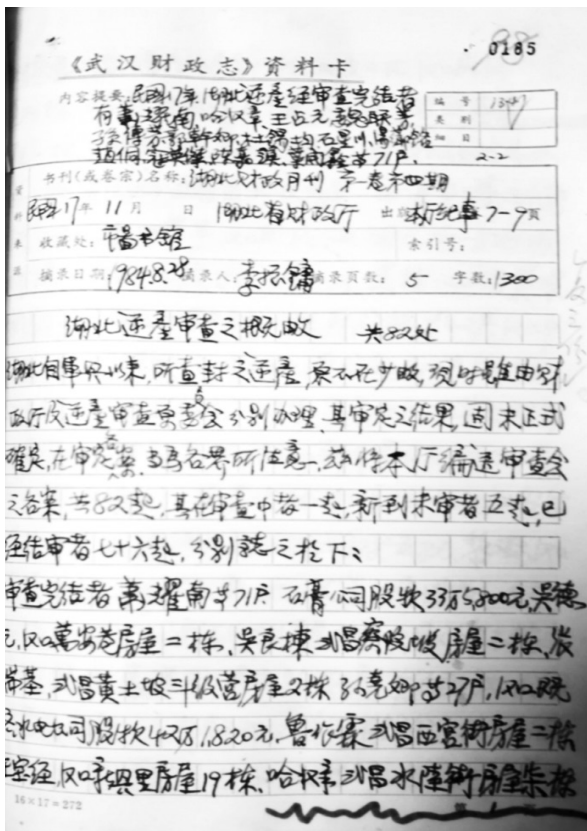
几经周折，赴京城找关系，念在蔡“辛亥元勋，首义有贡献”的份上，方网开一面，1933年经汉口地方法院执行，大陆银行才得到贷款抵押物希昌里，之后更名为大陆里。在1938年的《汉口市街详图》上，希昌里被大陆里取代。

“逆产”之谜

因为事涉“逆产”，官府判了却不能执行，使我产生了弄清“逆产”的念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发布的第一号《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布告》（1926年12月），主要议题就是“逆产”处理。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1页全文刊登了此布告：

“武汉前在军事时期，商工业一时停滞。军事既定，秩序立即恢复，一般人皆可各安生活。惟军阀在鄂吞蚀国库，敲诈人民之逆产，前经查封或没收，一般人不察，误



《武汉财政志》资料卡

谓此后尚当多所牵连，甚至累及私人资本，市面隐有不安之象。兹特剴切布告：国民政府保障人民资产之安全，非依法律不得查封及没收。至逆产问题，须由财政部彻查。其已经查封或没收之逆产；概由财政部管理。嗣后，无论何人不得挟嫌捏报，无论何机关除财政部外，不得执行查封。自此布告之后，商民人等务各安心营业。特此布告。”（摘自《湖北政府公报》第5期，1926年12月27日）

“逆产”处理作为第一号发布，可见武汉国民政府重视的程度，或为筹措继续北伐之军费？“逆产”既然查封或没收，我推测应该有相关资料，但不知从何处查找，于是委托票证收藏家朱汉昌留意，直到2021年，朱汉昌打电话告诉我找到了。第二天我赶往他家，在厚厚的一摞资料装订本中，从

20世纪80年代修地方志时的一份手抄件上（抄至武汉图书馆1928年《湖北财政月刊》第一卷第四期资料卡），发现有“湖北逆产审查之概数，共82处”。

我又委托在武汉图书馆工作的“人文武汉”团队成员王钢，最终找到了湖北省财政厅长张难先题写封面的《湖北财政月刊》。

“湖北自军兴以来，所查封之逆产，原不在少数，现时虽由财政厅及逆产审查委员会分别办理，其审定知结果，故未正式确定，在审定各案，当为各界所注意，兹将本厅编送逆产审查会之各案，共八十二起。”其中，就有“蔡汉卿，汉口希昌里房屋五十五栋”，抄件与原件一字不差。

武汉规划研究院《人与城市》记者虞珺珺听我讲述后，在《都市乡愁何处寄回首再望巷弄里》写道：“近百年前一个看似简单的里分名字变更，背后潜藏着辛亥革命史、北洋史、民国史，汉口的城市建设史、商贸史。”从2013年到2022年，历时近十年，终于将蔡汉卿建造的“希昌里”与“大陆里”联系在了一起。用田联申的话说，发掘大陆里更名史的过程，就是“人文武汉”团队成员通力合作对武汉城市史刨根问底最好的实证。

意外的收获

大陆里一街之隔就是多闻里。童年小伙伴玩“官兵捉强盗”游戏，常常躲到多闻里。那时，进入多闻里前行几十米左侧，有一直径约10米的圆形假山水池，今已不存。为何多闻里会有水池？因为大陆里及周边的里分均无水池。

《武汉地名志》记载，多闻里“20年代后期形成里巷，紧邻当时市政府花园。传

因在此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故得名多闻里”。多闻里的北边旧府街(今民主街)对面，为民国时期(1927—1938年沦陷前)的汉口市政府(一度为武汉市政府)所在地。原来，多闻里水池为市政府花园的组成部分。

但《武汉地名志》上，没有多闻里开发商的记载，那时的里分为私人及银行、公司所建，除自住外多作为公寓、商铺出租。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在找大陆里前身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多闻里也为《湖北财政月刊》刊登的“湖北逆产审查之概数共八十二处”之一，“汤芑铭，汉口多闻里房屋二十九栋，东方旅馆股款一千元”赫然在目。

多闻里为汤芑铭所建，多闻里名字的来由，我推测与此时汤芑铭研究佛学有关联。汉阳归元寺供奉的四大金刚中，有护法大神多闻天王，故名多闻里。多闻里建于1925年，《汉口商业一览》1926年出版，其上就有位于多闻里街面商铺的鹤阳茶馆，而汉口市政府1927年4月才成立，“传因在此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故得名多闻里”之说不能成立。

汤芑铭何许人也？

汤芑铭(1885—1975)，字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汤化龙(辛亥革命前后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军政府民政总长)胞弟。他1904年选送到西欧留学，先后赴法国、英国习海军，在巴黎由孙中山发展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任职于长江舰队镜清、南琛两舰，次年调充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

起义，10月12日汤芑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武汉，协助陆军大臣荫昌反攻，后奉命改驶九江。据李春萱1956年《辛亥革命首义纪事本末》回忆：“李作栋到了九江，先与海军司令汤芑铭见面，除了面交他哥哥汤化龙(注：时为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给他的私函外，首先请海军迅速援鄂。”汤芑铭表示“我以桑梓关系，义不容辞，但须留在会议席上解决。”“11月11日下午，由汤芑铭、杜锡珪和湖北代表李作栋等，率领三大战舰及其附属的小兵舰等开抵青山下游，各战舰为了本身安全，按照航行路线靠近汉口一面行驶，且行且用大炮轰击，清军猝不及防，死伤人数很多。”

可见，在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时，汤芑铭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任海军部次长。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1912年9月19日授予蔡汉卿陆军中将，11月4日授予汤芑铭海军中将。两人均系辛亥革命功臣。十多年后，两位中将投身房地产开发，分别建了希昌里(大陆里)、多闻里。



汉口前进一路多闻里

鹤阳茶馆

多闻里民主一街与前进一路的西北转角处街面，有两层砖混结构的红瓦楼房建筑，其二楼是现在已不多见的木结构内凉台，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一座茶馆——鹤阳茶馆。1926年的《汉口商业一览》茶馆一栏中记载有鹤阳茶馆，是其记载的103座茶馆中唯一旧址仍在的老茶馆。

过去，人们从鹤阳茶馆楼下走过，听得见楼上的锣鼓声，抬头看得见化了妆的演员，晚上还能依稀听见时断时续的楚戏悲腔回荡。按照汉口茶馆“清水”（只喝茶，不打牌、不唱戏）和“浑水”（唱戏、说书、打皮影戏、标会，乃至打牌赌博皆可）之分，鹤阳茶馆当属“浑水”茶馆。那时，湖北第一个全国象棋冠军李义庭，常在这家茶馆下棋。楼下前进一路的门面，后为鹤阳副食品商店。

汉口的茶馆业曾有辉煌历史。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有两首写汉口茶馆：“水光山色座中招，瓷器精工用淡描。茶叶多兼瓜子大，沿河馆比后湖高。无数茶坊列市鬯，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

有资料显示：1909年汉口的茶馆多达250家，占武汉三镇茶馆的60%。伴随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汉口的人口日益增加，茶馆生意更为兴旺。1918年，汉口的茶馆增至



鹤阳茶馆旧址

696家。10年后，又增加到1117家。1931年武汉大水后百业萧条，大批失业者涌入茶馆，茶馆生意格外兴隆。1933年，茶馆竟增至1373家。武汉沦陷后，汉口茶馆残存250家，从此一蹶不振。到1949年解放前夕，三镇茶馆总共只有300余家。

300余家茶馆，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喝茶曾是汉口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茶馆也是工商业者会面洽谈常用的场所。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单一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茶馆逐步淡出市场。鹤阳茶馆的老板收业回了乡下，子女则在汉口长大。如今，汉口数百家茶馆的旧址找不到几个了，尚存的鹤阳茶馆，称得上是“茶馆记忆”的一个载体。

田联申，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李国平教授轶事偶记

◇ 胡继堂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七七级学生。由于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这一级的同学经历大不相同，单就年龄讲，有三十出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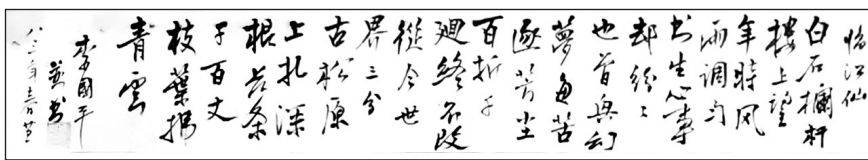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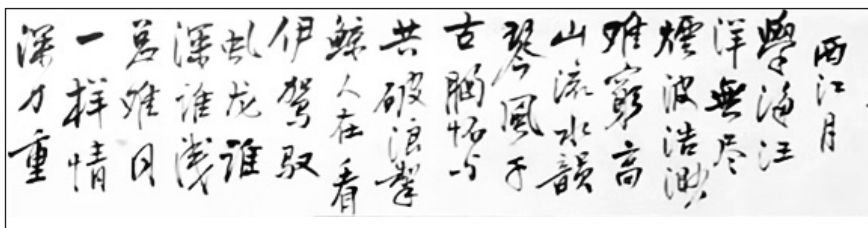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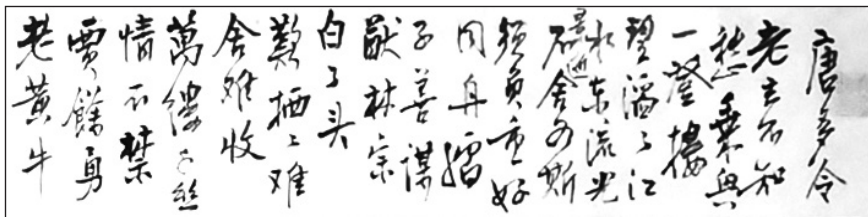
入学后住进老斋舍顶楼，到今天都没弄明白，我们哲学系学生怎么和数学系学生住一起。两系的同学见了面，几乎无话可说，难得有任何交流。常想，哲学系学生应该和历史系、中文系学生住一起才对。我在班上提出这一疑问，一位兄长同学是从武汉一所中学校长的任上考进来的，他十分正经地对我说，你眼光要放开，我们学哲学的，不仅要学习文科知识，也要对理科知识有所涉猎，因为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你想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多方



李国平教授

面的深厚知识，能写出《资本论》吗？所以你要有所准备，“文”要学一些，“理”也要懂一些，最好能做到“文理相通”。

随着教学的深入，哲学系也开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辅助课程，其中就有数学课，内容较为浅显。一天，我看到数学系贴



出一张海报，李国平教授有一场重要学术讲座，希望数学系师生踊跃参加。李国平教授是著名数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在全国数学界都很有名气。到了讲座那天，我心血来潮去听，还鼓动班上两位同学也去听。李国平教授讲了什么，我基本听不懂，他随手写在黑板上的公式，我更是如看天书，但后来在他身上看到了“文理相通”。

李国平教授是数学家，又是文学家和书法家。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慰问武汉市民盟老主委、武汉市原副市长郭友中，他曾在中科院武汉分院工作，也是著名数学家，与李国平教授是朋友。在他家中，我欣赏到李国平教授1983年书赠他的三首词，眼睛只觉一亮。

一首《唐多令》：老去不知愁，乘兴一登楼。望滔滔江水东流，光景逝，不舍如斯。须负重，好同舟。孺子善谋猷，林宗白了头。叹栖栖难舍难收，万缕千丝情不禁，贾余勇，老黄牛。

一首《西江月》：学海汪洋无尽，烟波浩渺难穷。高山流水韵琴风，千古胸怀与

共。破波掣鲸人在，看伊驾驭虬龙。谁深谁浅总难同，一样情深力重。

一首《临江仙》：白石栏杆楼上望，年时风雨调匀。书生心事却纷纷，也曾兴幻梦，每若逐芳尘。百折千回终不改，从今世界三分。古松原上扎深根，长条千百丈，枝叶拂青云。

三首词的书法或行或草，勾勒有力，衔接流畅，顾盼生风，典型

的“文人书法”。词的内容也好，如《临江仙》的最后几句“古松原上扎深根，长条千百丈，枝叶拂青云”，写得既深沉又飘逸，令人反复吟诵，浮想联翩。这几句，既可看成李国平教授对郭友中教授的称赞，也可看成李国平教授自身的写照。词牌《西江月》《临江仙》多见，而《唐多令》则不多见，可见李国平教授文学功底之深厚。

我后来学中外哲学史，得知许多名气大的哲学家，同时是自然科学家，其中就有数学家或天文学家。他们越是往后，越是专注于哲学，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哲学论断。

这就是“文理相通”，但要真正做到是极不容易的。李国平教授做到了，我们只能望词望字而兴叹。

胡继堂，曾任武汉市政协秘书长、副主席